

日常與監控： 1910年代前期日籍警察與臺灣地方社會

郭婷玉

摘要

研究者論及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統治時，大多同意其以警察維護社會秩序、處理戶政及治安等事務之高效率，而稱當時的臺灣為「警察社會」。不過，以此前提探討日本在臺警察制度之成立、活動、社會影響等議題，往往將警察視為一個為殖民者執行監控的工具，較少討論其在執行日常勤務中的個人活動樣態。由於缺乏呈現警察心態的記載，是以詮釋其與臺灣社會關係時，往往視之為殖民者整體的延伸，觀察角度較為單一。

若說警察是日本對臺殖民統治維持治安有效的工具，那麼警察制度法規在臺灣社會日常生活中的運作和執行、不同階段警務工作的變化和對地方社會的監控作用，以及日本人警察與比例占多數的臺灣人在地方社會之間的公私交流，都是值得進一步闡明的議題。

本文透過日籍警察吉岡喜三郎日記，探討其1909至1912年在臺南地區擔任基層巡查、「警部補」時的工作實態，以闡明警察制度如何落實到臺灣地方社會日常生活之中，並控制社會大小事務，致使臺灣被貼上「警察社會」的標籤。同時也透過吉岡在日記中的私人活動紀錄，輔以同時期《水竹居主人日記》作者張麗俊擔任保正時期與警察互動之經驗，觀察日籍警察在臺灣社會的公私交流和多面向社會角色。

關鍵詞：日本殖民臺灣、警察、地方社會、監控、吉岡喜三郎、張麗俊

Daily Life and the Surveillance: The Japanese Police and Taiwanese Local Society in the Early 1910s

Ting-yu Kuo^{*}

Abstract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s considered as a “police state” by most researchers, who agree on the high efficiency of police system at that time i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nd handling matters such 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public security. However, in their discussions of the Japanese police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the Taiwanese society, researchers often see police as a tool used by the colonizer to surveil the public. The policemen’s personal activities in their day-to-day duties have rarely been examined. This is largely due to a lack of documentation on the policemen’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mindset. As a result,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Japanese police in Taiwan tends to be one-sided, regarding the police as merely an extension of the colonizer in controlling Taiwan and focusing on the fear of Taiwanese society for it.

Even if we accept the view that the police was a tool for Japanese government to ensure public security in its colony, questions still need to be answered regarding the manners in which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governed police duties were implemented in daily life, changes in police dutie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effect of these duties on the surveillance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manners in which the Japanese-centered police and the local society, of which Taiwanese people accounted for the majority, interacted publicly and privately.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personal diary of a Japanese policeman Yoshioka Kisaburo,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Yoshioka’s actual situation at work in his roles

^{*}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s a *Junsa* (police officer) and *Keibuhou* (inspector) in Tainan between 1909 and 1912. It clarifies how the police system was implemented in the day-to-day life of the Taiwanese society and how the police controlled its daily affairs, large or small, thus rendering the colony a “police state.”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various social roles a Japanese policeman performed in the Taiwanese society. Yoshioka’s personal activities were documented in *Diary of Yoshioka Kisaburo*. Supplementing this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is the diary of Chang Li-jun, who served as a *Pao-cheng* or *Hosei* (the headman of 100 households) during that period.

Keywords: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nonial Rule, Police, Local Society, Surveillance, Yoshioka Kisaburo, Chang Li-jun

日常與監控： 1910年代前期日籍警察與臺灣地方社會*

郭婷玉**

壹、前言

1895年至1945年日本帝國在殖民地臺灣建立了一套深入地方社會的監視系統，由駐在各地方的警察執行，輔以臺灣人為主體的保甲組織，從而令殖民者得以掌握地方動向、維持統治穩定。有關警察對穩固殖民統治的功效及其制度的建立等，此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以下略為整理。

關於討論日本時代警察在臺灣地方社會形成監視網絡的課題，2001年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一文，以地理空間觀念結合歷史分析，探討國家機構行使權力、地方民眾人群發展生活關係與特定空間範圍「地域社會」的交互作用。施氏將日本時代臺灣地方社會空間劃分為街庄民、警察官、部落民三個層次，彼此分界而又相互統

* 本文修改自2018年11月22日至23日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宜蘭縣史館主辦之「第7屆日記研討會：日記中的臺灣社會」發表之論文，感謝評論人曾文亮教授及許雪姬教授、鍾淑敏教授等與會師長指教。另，承蒙呂紹理教授、許佩賢教授、曾令毅博士、陳凱雯博士，與兩位匿名審查人惠予修改建議，以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吉岡喜三郎日記解讀班」師長、學友的共同努力，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21年1月14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3月2日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合，形成國家落實統治、地方人群發展不同關係之場域。其中警察官空間的形成，來自於警察配置地點的空間分布，輔以所屬保甲、壯丁團的運作，而得以藉此空間執行國家公權力、維護秩序。¹ 施氏在文中分析警察在地方社會發揮作用的空間特性，啟發後進研究者從事進一步分析時，注意警察執行職務、與地方人群互動之空間關係。

論及日本時代警察在臺灣地方社會發揮之監視作用時，無可避免地會提到輔佐警察統整地方秩序的保甲制度，兩者合一方能形成完整的地方監視網絡。關於此一課題，2005年吳宗仁、張雅淨〈日治時期行政統治策略之後殖民分析〉一文，透過後殖民「他者」、「內部殖民」等概念，解析警察、保甲制度的落實與互相配合，在臺灣地方社會層面上消弭了反殖民抵抗，並建立起統治代理人制度，從而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統治。² 然而此文的這個論點似乎建立在假設制度實施即等於有效的統治即水到渠成，卻看不見制度在臺灣社會實施的實際樣態，包括臺灣人是否毫無抵抗地接受了比以往加強管束自身的新制度嗎？完全沒有抵抗即屈從嗎？若有，日本統治者又如何因應臺人反抗而調整施政策略？這些問題都懸而未決。

同樣是討論日本時代警察在地方社會配合保甲形成監視網絡，2008年蔡明志博士論文〈殖民地警察之眼：臺灣日治時期的地方警察、社會控制與空間改正之論述〉，應用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權力滲透至細部的討論及施添福「警察官空間」的概念。³ 另外，蔡氏也引用姚人多對日本殖民者透過精細統計數字掌握殖民地社會概況的「殖民治理性」⁴（colonial governmentality）概念，分析警察建築空間配置與分布點、社會監視機制的形成，以及警察代表的國家權力如何

¹ 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第8卷第1期（2001年10月），頁1-39。

² 吳宗仁、張雅淨，〈日治時期行政統治策略之後殖民分析〉，《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24期（2005年12月），頁89-110。

³ 蔡明志，〈殖民地警察之眼：臺灣日治時期的地方警察、社會控制與空間改正之論述〉（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頁1-4、10-12；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第8卷第1期，頁1-39。

⁴ 姚人多，〈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臺之殖民治理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頁119-182。

介入、改變臺灣人城鄉空間利用方式，討論臺灣社會如何隨警察系統扎根於各個地方而有空間、權力上的殖民現代化。⁵

2009年李幸真碩士論文〈日治初期臺灣警政的創建與警察的召訓（1898-1906）〉，不同於以上研究視警察為日本殖民統治的有效「工具」，關注日本殖民初期總督府在臺灣創立警察制度、培養警察隊伍的過程。李氏指出，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的警察制度並非一開始實施就相當完備，而是在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時期設置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招募並訓練日本人警察，同時慮及前者人力不足、不熟悉臺灣事務，而輔以臺灣人擔任「巡查補」（協助日本警察巡邏搜查的助手）。在此一體系中以日本人警察占據優勢，為了讓其擔負「指導開化」之責，也施以臺灣語訓練。透過上述歷程，才逐漸形成被後人稱為臺灣殖民統治基礎的「警察政治」。⁶ 此論文釐清此一制度如何創建、因應現地狀況做出哪些妥協與調整，並仔細整理了臺灣人巡查補制度出現前，各地前後任用臺人擔任警吏、巡吏，以及日本統治階層內部提倡設立臺人巡查補的折衝過程，由此反映日本統治時期臺灣警察制度創建的多重考量與調整嘗試實態。

綜觀以上研究成果，研究者大多認可日本時代臺灣警察具備落實殖民統治、控制地方秩序的功效，並稱當時的臺灣為「警察社會」。不過，在此前提下，警察往往被直接視為一個「整體」的工具，欠缺其在執行日常勤務中的個人活動樣態。這也是因為史料上較為缺乏警察個人視角的記載，使得研究者探討其與臺灣社會關係時，多直接視其為殖民者權力的延伸，聚焦於臺灣社會對警察的疑懼、對抗，致令相關討論較為單一。

所幸2010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經由臺灣文物收藏家鄭喬維先生及曾令毅博士（時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生）引介，得以收藏日籍警察吉岡喜三郎自1907年赴臺任職至1931年離臺之日記，補足了日籍警察視角史料闕如的空白。⁷ 加以前自2000年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陸續出版10冊《水竹居主人日

⁵ 蔡明志，〈殖民地警察之眼：臺灣日治時期的地方警察、社會控制與空間改正之論述〉，頁11、頁149-216。

⁶ 李幸真，〈日治初期臺灣警政的創建與警察的召訓（1898-190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⁷ 本文使用已解讀完成的1909年至1912年吉岡喜三郎日記，來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吉岡喜三郎日記解讀班」之集體努力成果。

記》，作者張麗俊出身臺中豐原，自1906年至1937年記錄日記不輟，其中也包括其於1899至1918年擔任豐原下南坑第1保保正時，對日籍警察的接觸與觀察。

筆者的疑問在於，若說警察是日本對臺殖民統治中維持治安的工具，那麼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貫徹執行工作內容？不同階段的警務工作有何變化？又對監控地方社會各自發揮了哪些作用？以日本人為主體的警察，與以臺灣人為多數之地方社會，有哪些面向的公私交流？代表殖民權力管控地方社會秩序的日本人警察，在日常生活中的私人面向又是如何？唯有解開這些問題，才能瞭解日本時代臺灣「警察社會」的真實複雜樣態。

本文研究時間範圍，考量到近代警察系統一直到兒玉、後藤時期才逐步建立，經過幾年磨合、調整，大概從1910年代開始在地方社會扎根、運作，遂選取1910年代前期為討論範圍。這個時期也正好是臺灣反抗日本統治活動逐漸平穩，殖民者加強投入警力以維持地方秩序，適合觀察警察系統落實於地方社會過程中，地方警察如何展開工作，地方民眾又是如何應對。而1910年代後期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日本帝國政經發展而牽動臺灣社會情勢，超出本文討論範圍，暫不討論。

以下，首先簡述臺灣近代警察制度與地方監控體系之形成過程，再以此為背景，討論基層警力如何被訓練成地方監控執行者，並透過吉岡、張麗俊日記的記載探討地方監控網之展開，整理日記中所記載警察、保正公務活動之外的私下互動，從而描繪出1910年代前期日本警察在臺灣地方社會的公私活動樣態。最後，亦以吉岡個人日記佐以回憶錄，呈現其在臺灣地方社會工作之餘的多樣私人生活面貌。

貳、臺灣近代警察制度與地方監控體系

本節簡單整理日本殖民初期殖民者將近代警察制度引進臺灣的經緯，並透過吉岡日記中記錄的職業生涯，說明一個殖民地基層警察之養成過程。

一、殖民地臺灣的近代警察制度

1895年日本在與清帝國之間的甲午戰爭中取勝，透過「馬關條約」正式取得首個海外殖民地臺灣的統治權。不願就此接受日本殖民統治的部分臺灣官民於5月25日宣布成立臺灣民主國，日方於是在5月29日派遣近衛師團登陸進行武力鎮壓，和從北到南群起的各地臺灣反抗勢力發生戰鬥。6月17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臺北城舉行了始政儀式，正式宣告日本開始對臺灣進行統治，日本在臺統治主軸也必須逐漸從軍政轉換為民政。

當時日本統治者一方面必須面對臺灣各地仍層出不窮的反抗事件、紛亂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也不能再像之前大舉調動軍隊武力鎮壓反對分子，經內務部警保代理課長千千岩英一建議、統治階層內部幾度討論，引進了日本本國也才實行二十多年的近代警察制度，成為在臺維持社會秩序之主力。根據鷺巢敦哉《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之記載，當時由於日本本國還未面臨人口壓力問題，臺灣又被視為惡疫猖獗之地，並沒有什麼傑出人才願意前往。最初的募集條件只有儘可能是獨身者、有蓄鬍、通曉劍道等。從日本全國募集到臺灣的759人中，多半出身九州，分為警部67人、巡查692人，於1895年9月、10月分乘兩艘船抵臺，派至各地開展警察系統。⁸ 又因警察系統處於草創時期，來臺之日本警察不瞭解臺灣風俗、語言而難以遂行警察事務，遂選拔「本島人」（臺灣人）中「品行方正」、「多少具備學歷素養」者，充任巡補或警吏，負責輔助警察進行偵察工作、擔任翻譯等事務。⁹

臺灣近代警察系統的廣布，隨著1896年4月地方官制分為十二廳，開始在概要地區設置警察署、分署，並配置警部、巡查。但是，此期間臺灣各地反抗事件依然不絕、加以疾病流行，1898年乃木希典總督於是施行三段警備制，將臺灣各地劃分為三等，由軍隊、憲兵、警察分別守備。¹⁰ 不過，三段警備制在實行上不易劃分三等區域，常造成軍隊、憲兵、警察權責不明或衝突。同年3月，新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旋即取消此制。同時兒玉、後藤鑑於

⁸ 鷺巢敦哉，《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臺北：出版者不詳，1938年），頁1-9。

⁹ 石川忠一，《臺灣警察要論》（臺北：新高堂書店，1915年），頁122。

¹⁰ 石川忠一，《臺灣警察要論》，頁122-123。

「土匪」漸次歸順，為有效配置警力以達控制目的，在警政上亦推行諸多改革，例如1898年改集合制為散在制，在各地村莊設置派出所、配置警力。後來更將地方數個派出所組織為一個監視區，每一監視區由警部或警部補巡邏監視。1899年正式將警吏、巡補改稱為巡查補。1901年全臺行政改制為二十廳，並在各廳設置警務課，任命警部擔任支廳長，設置巡查、巡查補輔佐其專門執行警務，並將巡查補視為判任官（此處指由臺灣總督任命的一般官吏）待遇。¹¹

在地方建立警察監視網的同時，兒玉、後藤於1898年以「保甲條例」將原來臺灣地方社會就有的保甲系統正式納為社會監控一環，一則採連坐方式讓臺灣社會人民互相監視、箝制；二則讓保甲成為警察在地方維護治安、控制秩序、從事各項社會調查等的助力。到了1901、1902年左右，保甲制度逐漸遍布於全臺各地。¹²

由以上簡述可知，日本帝國開始統治臺灣之初，即因兼顧平定社會秩序、實行民政需求，定下以警察成為維持社會秩序主力的統治基調。引入近代警察制度時以日本人為警察主體，讓警察成為統治者控制地方社會的一環。到了兒玉、後藤時期，「警察加保甲」的控制網大致底定——以警察控制地方社會秩序的部分，採取散在制雖有分散警察力量、提高人力成本之虞，但能讓警察監視網更加深入地方社會各個角落，強化落實殖民統治政策與監控能力。輔以臺灣人為主的巡查補、保甲集團，日本警察得以更為瞭解臺灣民情，同時獲得在地方執行警務之人力輔助。

二、基層警察養成過程：以吉岡喜三郎為例

日本殖民統治者自實行民政後不久，即開始在本國招募適任的單身男性，來臺灣擔任警察。本文所使用吉岡日記的作者吉岡喜三郎（圖1），即是因此在1907年來臺投身警職。

¹¹ 石川忠一，《臺灣警察要論》，頁123-125。

¹² 蔣巢敦哉，《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頁242-250。



圖1、1924年擔任彰化郡警察課長時期的吉岡喜三郎

資料來源：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千葉縣：長谷川明郎發行，2008年），無頁碼。

吉岡喜三郎於1882（明治15）年出生在日本千葉縣木戶臺（今日本千葉縣山武郡橫芝光町木戶臺）的木材商家庭，是為次男，有一兄一妹。¹³ 從其於1931年書寫的履歷來看，他沒有像哥哥榮亮一樣留在故鄉繼承家業，而於1907年參與募集臺灣巡查的考試，5月出發至臺灣，進入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乙科成為巡查練習生（圖2。甲科招收現職巡查為警部練習生）。在學校接受的教育課程，內容包括學習警察官服務、刑法、武術，以及臺灣相關之鴉片、戶口、衛生、防疫、土語（福建語、廣東語、蕃語）。¹⁴ 同年8月，吉岡被任命為臺南廳巡查，任職於警務課。1907年8月底調任至大目降支廳（今臺南市新化區一帶），階級為巡查、月薪12圓。根據其回憶錄《古稀の思出》的記載，1908年7月起開始擔任內勤巡查。¹⁵ 根據1902年8月內訓27號公布之「警察職務規則施

¹³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千葉縣：長谷川明郎發行，2008年），頁55。

¹⁴ 〈吉岡喜三郎文書介紹〉，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251776>（2018/9/10點閱）。

¹⁵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44。

行細則標準」第17條，內勤巡查承上官命令而負責登記收發件名簿、謄寫文書、訂正法令例規、編纂文書、整理名簿及臺帳、輔助統計事務、整理被服及其他備品、整理槍枝彈藥、輔助經費預算決算等事項。¹⁶ 1909年9月，又調任至噍吧哖支廳（今臺南市玉井區一帶）。



圖2、東京以北東北各縣巡查練習生紀念攝影
（1907年7月6日，吉岡為第1排右1者）

資料來源：「明治40年7月6日東京以北東北各縣練習生紀念攝影」（1907年7月6日），〈吉岡喜三郎在臺時期照片〉，《吉岡喜三郎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數位典藏，典藏號：T0747_03_0001。

1910年6月9日的吉岡日記，提到他到臺南市參加「文官考試」，在接下來的幾天內於臺南公館接受了漢文、作文、地理、數學、法律、土語譯文、土語會話等筆試測驗。7月8日，接獲參加文官考試口試的通知；18日，冒雨至臺南市的臺南公館應試；29日，即接獲文官考試合格證書。¹⁷ 此處的文官考試為1899年開始

¹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蹟篇」（臺北：編者自印，1934年），頁500、502-503。

¹⁷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0年6月、7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

在臺灣施行之日本文官考試，吉岡接受的是一年舉行一次的文官普通試驗，通過後可取得判任官資格。¹⁸ 根據其於1931年書寫的履歷，吉岡於1910年7月22日通過臺灣總督府普通文官考試，8月25日即獲任命為臺南廳警部補、月俸22圓，調往臺南廳警務課任職。¹⁹ 而在通過文官考試到被任命為警部補之前，他又在8月6日參加了「甲科生入所考試」，後來雖未於日記載明結果，但顯然是通過了考試，是以其在8月29日從噍吧哖支廳正式離職後，並未到臺南廳報到，而是在8月31日抵達臺北、向練習所報到。9月1日起，他以甲科練習生身分，進入了位於臺北的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這裡的甲科係選拔自現職巡查，需在臺灣任職滿一年，身心強健、素行良好，由地方長官推薦擔保並通過入所試驗者，方能入所修習，修習期滿及格者可取得判任官任用資格。不同於前述吉岡1907年剛到臺灣時就讀之乙科，甲科生及格者將是未來臺灣警察界的中高級幹部。²⁰ 不過，由於吉岡在入所前已通過文官考試、獲得警部補任用資格，故而係以警部補身分入所訓練，和其他同期者皆為巡查身分不同。

吉岡進入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修業十個月後，於1911年7月1日領到結業證書，隔日返回臺南，稍事休息後在7月4日正式以警部補身分到臺南廳警務課任職。²¹ 1912年2月至7月又奉命到東京進入警察官練習所修業²²——該所係由東京警察協會經營，定期招收日本內地各府縣現職警部、警部補入所訓練，為期六個月，也從殖民地臺灣、朝鮮選拔數人前往受訓，吉岡即在此列之中。據其回憶，能夠獲選進入東京練習所，等同於進入警察大學，是比之前進入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甲科還要讓人稱羨。特別當時的吉岡不過是一個30歲的年輕警部補，卻獲此殊榮，自己也感到相當得意。吉岡結束進修後，再度回臺

¹⁸ 蔡慧玉，〈日治時期臺灣行政官僚的形塑：日本帝國的文官考試制度、人才流動和殖民行政〉，《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33-48；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46-47。

¹⁹ 「吉岡喜三郎任地方理事官、俸給、勤務、依願免官」（1931年9月1日），〈昭和六年七月至九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066098。

²⁰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蹟篇」，頁765；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50。

²¹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0年7月1日至7月4日。

²²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52-53。

任職，於1913年7月升任臺南廳警部。²³

從以上簡歷可知，吉岡來到殖民地臺灣投身警職數年，即從基層巡查一路升任警部，達到「立身出世」的成就。但是，簡歷並未載明他在這幾年間做了哪些工作，才獲得逐步晉升。為此，下文利用三個章節整理其於1907年至1931年在臺擔任警察寫下之日記，闡述其於1909年至1912年在臺南地區擔任基層巡查、警部補的工作與生活記錄。希望透過釐清他在臺任職的工作內容，究明後來被稱為日本殖民臺灣統治基礎的「警察社會」，是如何透過一名基層警察的每日日常生活累積而成。

叁、地方警察的職業訓練

關於殖民者在臺灣如何訓練近代警察，前文提及李幸真的碩士論文已經詳述日本人警察、臺人巡查補等的招募及訓練過程。不過，警察在訓練所接受過幾個月學科、術科教育，下放到地方社會從事警職後，如何蛻變成一名監控地方的執行者？從吉岡日記中常見的點檢操練、巡查教育兩部分記載可知，其人在地方持續接受職業訓練，對警察系統在臺灣各個地方社會展開監控網絡有一定程度的關連。

一、點檢操練

吉岡在巡查時期（1909年至1910年7月）的日記中，不時會提及接受定期點檢、操練之事。根據1931年出版的《臺灣地方警察實務要論》記載，各地警察課、警察署、警察分署、支廳於每月兩個特定的日期，召集轄區內的巡查，施以有關職務的重要訓話、點檢、操練、學術講習、考試，以及報告轄區狀況等事宜，稱為「定期召集」。定期召集分為甲種、乙種，是將內外勤及轄區內各派出所等地巡查召集至所屬官署，使其藉機進行職務交流、傳達通報事項或詢問事務

²³ 「吉岡喜三郎任地方理事官、俸給、勤務、依願免官」（1931年9月1日），〈昭和六年七月至九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典藏號：00010066098。

處理，並交換管區內民情等。²⁴

定期召集中的點檢，係由支廳長對轄下之警察進行包含人員之服裝儀容、武器槍械、召集訓練、禮儀姿勢、宿舍內務等檢查。根據1904年「臺灣總督府巡查補點檢規程」，點檢又可區分為甲種、乙種兩類：甲種點檢針對人員、服裝、姿勢、禮式、操練、槍器等其他日常攜帶品進行檢查；乙種點檢則是確認公家配發之制服、裝備、槍枝附屬品等的保管品質以及宿舍狀況等項。甲種點檢針對在廳或支廳值勤與否分為每月1至3次，乙種則是每月1次以上。²⁵ 操練（圖3）則常與點檢一同實行，係針對警察官吏值勤時配帶之槍枝或劍，進行步兵禮式的戰鬥動作訓練，有時亦從事實彈射擊。²⁶

可能是對於日常例行公事省略記錄之故，吉岡並未一一記載參加點檢、操練的情況，粗估1909年記錄13次、1910年1月至8月記錄4次。從日記來看，點檢、操練通常是一起進行的，如1909年2月5日，吉岡一整天都參加點檢、操練。上午8、9點半開始點檢，10點起有訓授、12點結束。²⁷ 下午1點至3點操練，接著是擊劍，5點結束離廳。點檢、操練也不是固定時間，而是依照支廳長要求在彈性範圍內進行，例如1909年3月各於5日、15日、29日進行了3次點檢。每次點檢的內容也不一定，像是1909年4月5日的點檢，特別在下午1點安排到虎頭山埤（今臺南市新化區虎頭埤一帶）進行實彈射擊，吉岡獲得了10等賞。5月5日的點檢則是只有上午，下午沒做什麼就結束了一天。點檢地點亦不固定，如4月5日到虎頭山埤實彈射擊，6月5日則是在上帝廟（推測是位於今臺南中西區的臺南北極殿）從事操練。²⁸

²⁴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輯，《臺灣地方警察實務要論》（臺北：無名會出版部，1931年），頁127。

²⁵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蹟篇」，頁1141-1144。

²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蹟篇」，頁1150-1153。

²⁷ 訓授：據1904年「點檢及訓授規程」規定，所謂的訓授係由支廳長對轄下之警察進行教授訓示，內容包括人員服務規則、法規要旨、業務執行，訓授事項及內容則以日誌形式記於訓授錄內，以供存查參考。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蹟篇」，頁1144-1145。

²⁸ 如引用吉岡日記之日期已於文中說明，為免繁雜，即省略逐一做註，以下同。



圖3、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練習生操練一景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蹟篇」（臺北：編者自印，1934年），無頁碼。

另外，前文提到定期召集並不是只有體力、服儀檢查的點檢操練，還包括學術講習。所謂的學術講習，係根據1904年「臺灣總督府廳警察官吏學術講習規程」規定，應對於巡查、巡查補就土語及國語（週二、四，一個小時以上）、法令及例規（週一、三、五，一個小時以上）、武術及施繩法（週六，兩個小時以上）及其他職務上必要之事項，進行定期講習。對於吉岡這類在廳或支廳執勤的人員，是跟點檢、訓授同日進行學術講習。學術講習的講師、助教，以及測驗內容，均由警務課長或支廳長決定，再向廳長報告。巡查、巡查補每年需進行2次（6月及12月）考試，可採口試或筆試，以100分為滿分。²⁹ 吉岡在1909年10月22日提到當日上午9點的點檢因值宿而未參加，10點半起有學術筆記測驗。1910年2月7日的定期召集中，則是在上午的點檢、操練、訓授後，下午1點進行學術測驗、4點結束。

透過上述定期召集中的操練、點檢，以及學術講習，包括吉岡在內的基層巡查獲得在地方執行警察職務所需之法律知識、情報交流、體能、語言訓練等進修機會，而能與時俱進，成為落實殖民統治政策於地方社會的基石。

²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蹟篇」，頁715-716。

二、巡查補教育

1911年7月，吉岡從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甲科結業後不久，於8月4日被任命為巡查教習所的教官。³⁰ 所謂巡查教習所，正式名稱為「巡查補教習所」，是對巡查補進行訓練、教育的場所。1899年7月，總督府以訓令第208號發布「巡查補採用及教習規則」；³¹ 1901年5月，又以訓令第174號發布了更詳細的「臺灣總督府巡查補教習所規則」。³² 根據後者的規定，巡查補教習所設置於警察課所在地，以警察課長或「警務係長」（「係」為課以下的編制）為所長，警部、警部補各一名擔任教官。巡查補的教習科目包括警察大意、職務必須之法規、巡查及巡查補服務規則、制服著裝及攜帶槍劍方法、敬禮、警察巡邏查察方法、犯人捕捉方法、公文製作方式等項目，教習期限一般為四個月、得依地方長官決策而增減。一天上課六小時，修業完畢後參加測驗合格者獲得畢業證書。

吉岡獲任命為巡查補教習所教官後，與另兩位教官佐佐木源助警部、村井知德警部補輪流授課，所長為臺南廳警務課警視、警務課課長澤井瀨平。³³ 從日記上記錄的執教生涯來看，吉岡自1911年8月4日獲得任命到12月1日結業為止，執教的這期巡查補教習所上課時間剛好滿法規所定之四個月。他也堪稱敬業，4日甫獲任命、6日即著手準備製作教案，此後四個月期間，大約固定在週二、週五到教習所授課一兩節課，同時要兼顧自己的勤務，如四處巡邏（8月8日）、參加擊劍活動（8月15日）、巡視監視區（9月8日）、為法院預定地進行實地視察（9月26日）、進行鐵路軌道巡視（10月6日）。按理而言，吉岡升任警部補後本身的勤務較之前忙碌許多，但是在兼任教習所教官期間從未有抱怨或請假的日記記載，一直到11月25日幫巡查補教習生考完畢業測驗，12月1日結業儀式當日也和廳長、訓練所上司同僚及畢業生一同參與茶會（圖4為1914年結業儀式之事例）。

³⁰ 「吉岡喜三郎任地方理事官、俸給、勤務、依願免官」（1931年9月1日），〈昭和六年七月至九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典藏號：00010066098。

³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蹟篇」，頁715-716。

³² 「臺灣總督府巡查補教習所規則」（1901年5月24日），〈明治34年5月臺灣總督府報第962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71010962a005。

³³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1年12月1日。

從吉岡細密地記載到巡查補教習所授課的這段時間，可以看出總督府確實建立了一套針對巡查補的在職訓練系統。如同前述，總督府一開始囿於日籍警察人力不足、不解臺灣地方風俗，而需要起用原本相當提防的臺灣人擔任巡查補。但是一旦採用後，便利用同樣值勤於地方的中高階日本警察做為教育者，培養巡查補成為在地方執行警務、協助政策落實的助力。同時也藉由警部、警部補授課過程剔除不能聽命行事者，確保巡查補之協助功能。從這點來看，乍看之下與警察監控地方社會沒有直接關連的巡查補教習事務，亦是一種對地方社會（按：申請擔任巡查補者需先經審查）、對基層警力內部的掌控系統。



**圖4、「臺南廳巡查補教習生卒業式紀念」攝影
（1914年6月11日，吉岡為第1排右2者）**

資料來源：「大正3年6月11日臺南廳巡查補教習生卒業式紀念攝影」（1914年6月11日），〈吉岡喜三郎在臺時期照片〉，《吉岡喜三郎文書》，典藏號：T0747_03_0001。

肆、警察職務與地方監視網之展開

對於總督府而言，在地方社會設置警察系統，是落實統治政策、掌握地方民情之利器。那麼，基層警察每天職務有哪些種類呢？他們怎麼進行工作、這些工作又對掌控地方社會有什麼功效？透過吉岡日記，可以看出不同警察位階負責相異工作類型，配合保甲組織的運作，在臺灣地方社會逐漸張開監控網絡。

一、整理戶口調查名簿

關於警察在戶口調查中的角色，如林佩欣博士論文指出1903年至1908年在臺灣實施臨時戶口調查的準備、實施階段，各地、各階層警察均投入實施講座訓練、進行調查，是調查得以落實的主要執行人力。³⁴ 對照1909年至1910年8月吉岡擔任巡查期間的日記，1909年有130次整理戶口名簿之記載，1910年的八個月間更高達166次。1909年這一年從9月14日至噍吧哖支廳任職後，到該年底的三個多月間，扣除掉週日休息，有八十天都在從事戶口事務。

這個時期吉岡的主要工作，是依照1905年總督府頒布之「人口動態報告規程」，以紙條形式的「人口動態小票」即時記載轄內生產、死產、死亡、結婚、離婚、轉住等六類人口動態資料，以備戶口調查簿編寫時之參考紀錄。當月編寫的人口動態小票，加上概要計算當月各類人口變動的目錄，於隔月5日前發送至總督府。³⁵ 例如1909年5月7日至15日間，吉岡除了12日因瘧疾（Malaria）感到不適而休假一天外，都從事戶口動態小票之製作，直到15日製作完畢發送出去為止。³⁶

吉岡擔任巡查時之所以主要從事戶口調查事務，係因戶口調查施行自始就被規定為警察業務之一。在1905年總督府頒布之「戶口調查規程」規定中，第一

³⁴ 林佩欣，〈臺灣總督府統計調查事業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頁79-140。

³⁵ 「人口動態報告規程」（1905年9月19日），〈明治38年9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831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831a002。

³⁶ 《吉岡喜三郎日記》，1909年5月7日至5月15日。

條就開宗明義提到「戶口調查以知悉戶口狀態、提供警察資料為目的」。³⁷ 戶口調查事務分為戶口實查、戶口調查副簿整理、戶口調查簿（圖5）整理等三個部分。戶口實查由巡查、巡查補實行，到現地住家訪查戶口及鴉片吸食、纏足、種痘等事項，並將變化情形整理於戶口調查副簿。戶口調查簿則置於支廳，亦由巡查或巡查補輔助廳長或支廳長進行整理。負責戶口事務的巡查、巡查補每六個月至少須將戶口調查副簿與戶口調查簿核對一次，並請戶口主務（以警部、警部補充任）在戶口調查成績表上蓋檢驗章，是為「照合」。³⁸ 因此在1910年3月16日的吉岡日記中，記載當日「從事同上（戶口事務），以及戶口簿照合」；7月13日提到「本日提交戶口半年表」，³⁹ 應該是同樣在進行戶口「照合」手續。（圖6為1915年相關事例）



圖5、戶口調查簿冊一例

資料來源：「戶口調查規程發布ノ件」（1902年6月12日），〈明治36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54卷戶籍人事社寺軍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0854002。

³⁷ 「戶口調查規程」（1905年12月26日），〈明治38年12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887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887a002。

³⁸ 「戶口調查規程」（1905年12月26日），〈明治38年12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887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887a002。

³⁹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0年3月16日、7月13日。



圖6、下粗糠崎⁴⁰派出所裡正心社第2回臨時戶口調查紀念攝影
(1915年10月3日，吉岡為第1排左3者)

資料來源：〈大正4年10月3日下粗糠崎派出所裡正心社第2回臨時戶口調查紀念攝影〉
(1915年10月3日)，〈吉岡喜三郎在臺時期照片〉，《吉岡喜三郎文書》，典藏號：T0747_03_0004。

前文提到，吉岡自從1909年9月14日調到噍吧哖支廳後，到當年底的三個多月間共一〇九天，即有八十天從事戶口業務。1910年1月至8月底的八個月間更高達166次，平均每個月二十天、亦即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從事戶口事務。他並沒有在日記中提到對於長期從事同一類業務是否感到厭煩或無趣，頂多只有在1910年4月29日提及「本日上午，積累了許多戶口文書，相當忙碌」，⁴¹顯示出他是該派出所唯一主管相關業務者，若是請假即會累積非常多工作量。後來他在回憶錄中提及此段生活，才直言每日從事戶口事務感覺「單調」，但因自己一人整理戶口簿、書寫抄本、製作戶口小票游刃有餘，過得還算輕鬆。⁴²

⁴⁰ 下粗糠崎：今臺南市慈聖街與西門路2段381巷（昔稱聖君廟街）交口以南一帶，以北則稱為頂粗糠崎。此地和昔日米街（新美街）很接近，人們常將碾米後剩餘的穀殼棄置於此。再則此地位於西門城邊，除了與城內有一高度落差外，地勢也較低溼，因而得名。

⁴¹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0年4月29日。

⁴²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46。

臺灣自1896年開始從事小規模戶口調查，1905年10月1日更實施首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讓總督府逐步建立起掌握臺灣社會人口、性別比、婚姻狀況、種族、年齡、職業、產業等的龐大資料庫。⁴³ 過去研究者提到日本殖民時期的戶口調查時，多直接利用官方調查成果，分析初次調查的規模及意義、調查成果之龐大與完整度等，進一步論證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統治的各項政策制定、調整正是立基於此一浩大且持續完備的戶口資料庫。而從吉岡日記的記載，則可看到這些調查資料如何在「後台」形成、如何一步步累積而成為日本統治者掌握臺灣社會方方面面的依據。

換言之，吉岡日記記錄其擔任基層巡查的二十個月、六百多天，近半數時間都用在臺南偏遠地區小小派出所中書寫、修改戶口資料的日常例行公事，而這正是在1905年初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形成臺灣人口資料庫雛形後，持續維持、更新資料庫內容，從而為後來日本統治者在臺灣統治時期掌控社會動向提供了基礎。

二、整理即決事件簿

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被稱為「警察社會」的緣由之一，在於為了加速穩定社會秩序，而賦予代表行政權的警察部分司法權，對部分司法事件進行「犯罪即決」。早在領臺次年，總督府即引進日本本國施行之「違警罪即決例」，以律令第7號公布「拘留又ハ科料ノ刑ニ該ルヘキ犯罪即決例」，賦予警察署、憲兵隊在其轄區內就拘留十日內或罰金1圓95錢以下犯罪，可直接進行裁決的「即決權」。⁴⁴ 根據內務大臣公布的立法理由，是有鑑於「本島人尚不習慣近代法律生活，所犯事件多為禁錮三個月或罰金一百圓以下輕罪」，若是這些輕微犯罪都一一應用繁瑣刑事訴訟手續將有礙司法進步，遂決定「由精通里俗民情之警察官隨時迅速地進行處分」。爾後更進一步於1904年以律令第4號公布「犯罪即決例」，將可由廳長或警部（按：1927年起增加警部補）依簡易程序進行即決之犯罪範圍，擴大為該當拘留或科料（罰金）刑罰之罪、應處主刑三個月以下

⁴³ 林佩欣，〈臺灣總督府統計調查事業之研究〉，頁90、122-128。

⁴⁴ 「拘留又ハ科料ノ刑ニ該ルヘキ犯罪即決例」（1896年10月1日），〈明治29年10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4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00014a001。

重禁錮之賭博罪、應處主刑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100圓以下罰金之違反行政諸規則罪。⁴⁵

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應用到犯罪即決制的部分，根據1923年出版的雲野修治《實務資料 犯罪即決》一書，包括賭博、暴行、偽造通貨、違反槍砲彈藥取締規則、違反槍獵取締規則、違反戶口規則、違反臺灣違警例、違反料理屋飲食店取締規則、違反書房義塾相關規程、違反外國旅券規則、違反鴉片令，以及違反食鹽等專賣規則等，總共30多項事務。⁴⁶ 可以說，總督府透過深入派駐於各地角落的警察，加以便宜行事的犯罪即決制，監控著臺灣社會傳統娛樂、教育、商貿、生活等各個方面，逐步將之規訓為日本殖民者可以掌控秩序的殖民地。

此一行政、司法混合制度的基礎，即是記載對犯罪人判決主刑、換刑、罰金等的記錄文書「刑事犯人票」（圖7）、「即決事件簿」。所謂刑事犯人票，係法院、檢察局、廳、支廳針對違反刑法全部或行政諸規則中科處拘留十日以上、罰金2圓以上犯罪者（違反臺灣違警例除外），在逮捕、移送時必須依該票格式填入有關犯人基本資料、犯罪狀態、犯罪處分等一切刑事關係事項。⁴⁷ 另，根據1904年訓令122號公布之「犯罪即決例施行手續」，即決官署需備妥即決事務法令綴、懲役罰金即決事件錄、懲役罰金即決事件「言渡書綴」（宣告書）、懲役罰金即決事件記錄、拘留科料即決事件簿、拘留科料即決事件記錄及「言渡書綴」、犯罪即決事件受託簿等簿冊。⁴⁸ 筆者推測，吉岡在日記中記載協助整理之「即決事件簿」是以上簿冊的統稱。

1909年至1910年8月吉岡擔任巡查時期，主要在1909年1月至8月期間記錄了37次協助處理即決事務、整理相關文書的動態。他從事的工作內容主要是記錄即決事件簿（例如1月9日）、輔佐即決事務（例如1月28日）、訂正即決相關文書（例如2月4日）、編纂即決簿冊（例如2月8日）、整理刑事犯人票及犯罪人名票

⁴⁵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下卷）：司法警察及犯罪即決の變遷史」（臺北：編者自印，1942年），頁328-333。

⁴⁶ 雲野修治，《實務資料 犯罪即決》（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23年）。

⁴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下卷）：司法警察及犯罪即決の變遷史」，頁797-798。

⁴⁸ 雲野修治，《實務資料 犯罪即決》，頁205-206。

（例如6月1日），⁴⁹ 一個月平均進行4、5次相關事務。當時身為基層巡查的他，沒有下達判決的即決權，僅以整理文書方式參與其中。

[illegible]

圖7、犯罪人名簿樣式之一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下卷）：司法警察及犯罪即決的變遷史」（臺北：編者自印，1942年），頁773。

三、日常巡邏

吉岡升任警部補後，工作內容與以往大相逕庭，主要差別即在於升職之後負責職務亦產生相應變化，變得常出外巡邏，不再像以往一樣大多在派出所內整理戶口資料。根據1902年1月9日發布的「臺灣總督府廳警察職務規程」，派出所所屬之外勤巡查負有固定路線巡邏之責，亦分有負責區域。警部補則負責監督外勤巡邏事務（第5、9條）。外勤巡查從事的「警邏」（警戒巡邏）是按照轄區附近劃定路線，由巡查按照一定行程行走巡邏（第31-37條）。巡邏路線分為一個至兩個小時、一日來回、過夜等不同距離的行程，警部補之監督頻率亦有差別。例如警察課跟警察分室的警部、警部補，每天要巡視負責區域1次以上，每個月巡視2次非「所在地」與「駐在地」。⁵⁰ 另外，上述規程也規定，廳及支廳轄區有

⁴⁹ 犯罪人名票：依1898年所制定之「犯罪人名簿及犯罪通知規則」規定，支廳轄下判決確定之犯人必須將其資料先登載於「犯罪人名票」內，再定期整理成名簿，提供犯人現住地、本籍、移住地轄內之警察做為參考。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下卷）：司法警察及犯罪即決的變遷史」，頁769-770。

⁵⁰ 「廳警察職務規程」（1902年1月9日），〈明治35年1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088期〉，《臺

兩個以上派出所或駐在所的區域為1個巡視區，兩個以上的巡視區則設1個監視區（如圖8），由警部或警部補負責監督（第3-4條）。1911年5月31日發布之臺南廳訓令19號為負責監督監視區的警部補之服務內規，也反映警部補監督監視區的注意事項，包括定點巡邏、監控具犯罪傾向者、營業臨檢、戶口調查、保甲事務等事項。⁵¹再根據1911年6月8日發布的臺南廳訓令18號可知，臺南廳依照轄區區分各警部補所負責的監視區。吉岡任職所在的臺南市區，所轄地是警務課負責之「直轄」區域。直轄區域分六個監視區，第三監視區為竹仔街、總爺街兩個警察官吏派出所之轄區，吉岡在1911年7月12日被分派負責第四監視區，範圍包括下粗糠崎、南勢街⁵²兩個警察官吏派出所的轄區。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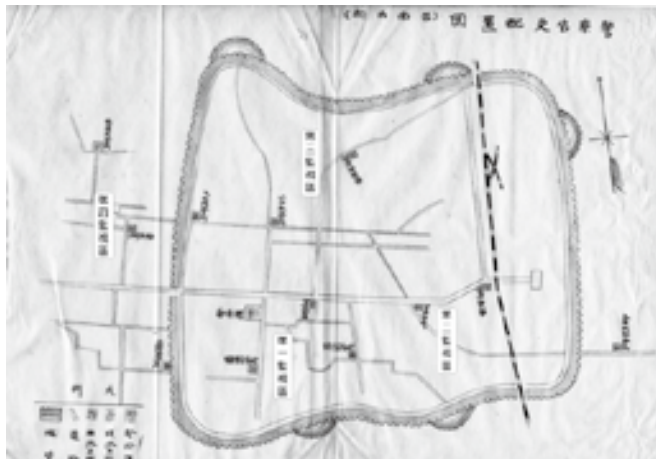


圖8、1903年臺南市區監視區分區範例

資料來源：「臺南廳長稟申警察官吏派出所廢合二關スル件認可」（1903年4月1日），〈明治36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5年保存第24卷警察監獄〉，《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744001。

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088a001；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臺灣地方警察實務要論》，頁54-58。

⁵¹ 「廳警察職務規程」（1902年1月9日），〈明治35年1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088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088a001；「監視區監督警部補服務內規」，《臺南廳報》，第681號（1911年6月10日），頁91-93；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臺灣地方警察實務要論》，頁43。

⁵² 南勢街：今臺南市中西區和平街一帶。

⁵³ 「臺南廳警察監視區及警察官吏配置定員」，《臺南廳報》，第680號（1911年6月8日），頁86-90。

吉岡升上警部補後的日記中，經常出現出外巡邏之記載。經過估算，1911年7月至12月共巡視71次，1912年1月、9月至12月巡視25次。吉岡的轄區是當時的下粗糠崎、南勢街（圖9），大概等於今天臺南市中西區一帶，是相當繁華的鬧區。根據日記記載，他每天巡邏的路線大多在轄區內，路徑則不一定。如1911年7月19日，他上午巡視莊雅橋、南勢街派出所；下午則巡視下粗糠崎、竹仔街、三界壇一帶。若以「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系統的1907年市區改正臺南市街全圖來推估，假設當日他從臺南廳出發、巡迴後也是回到臺南廳，則當日巡邏走動距離大約3.687公里。8月14日，他下午在莊雅橋、三界壇、竹仔街、南勢街、下粗糠崎一帶巡迴，走動距離大約3.239公里。10月16日，他上午途經三界壇、總爺街，到下粗糠崎街參加保甲會議，12點回廳；下午則到南勢街、下粗糠崎巡邏，一天下來總共走了約5公里。到了1912年，他的巡邏內容沒有太大改變，1月25日上午到竹仔街、南勢街巡視；下午則到下粗糠崎、莊雅橋一帶，步行約3.15公里。吉岡從日本進修回來後，9月25日巡視莊雅橋、三界壇、元會境一帶，步行約2.4公里。11月26日晚餐後巡視西竹圍、總爺街、下粗糠崎、南勢街等派出所，走了約5.2公里。12月26日，他則是下午4點起出發，巡迴竹仔街、南勢街、下粗糠崎、總爺街、西竹圍各派出所，步行約5.4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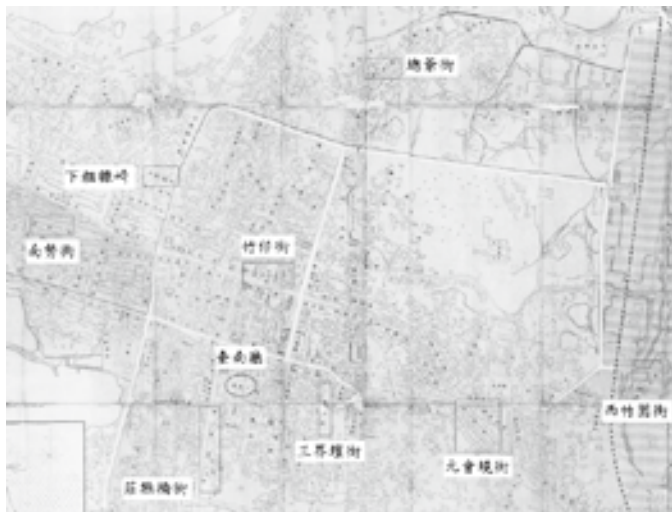


圖9、吉岡喜三郎轄區地圖

資料來源：〈1907年市區改正臺南市街全圖〉，收入「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2018/9/20點閱）。

巡邏頻率方面，吉岡在1911年7月至12月六個月間巡視71次，平均一個月10次。1912年1月、9月至12月五個月間巡視25次，平均一個月5次。這樣頻繁的巡邏頻率，規定於警察職務之中，首先帶來的監控作用即是提高見警率，讓地方社會民眾時常看得到警察在生活範圍內走動、巡視，而減低違反法規的可能。其次，吉岡身為警部補，巡邏職責之一是到各派出所督導，督導內容則無非是自己在巡查時期每天花許多時間整理的戶口簿冊、即決事件簿等文書，也是落實行政事務運作的一環。

再者，他也常在巡邏過程中，順便到「貸座敷」（妓院）、飲食店、戲院等娛樂場所，執行臨檢勤務。1901年臺南縣規定日籍「貸座敷」營業區域以南勢街為中心，在大西門外南勢街、下南河街與打棕街內安瀾橋通以東、得勝橋通以西之區域一帶營業。1907年又准許「本島人」的「貸座敷」設於粗糠崎、媽祖港附近，亦即外媽祖港街、王宮港街、聖君廟、頂粗糠崎街、下粗糠崎街等地。吉岡時常巡視的下粗糠崎街一帶，即為「本島人」的「貸座敷」所在地，其區域內設有派出所監督，並設有「貸座敷組合」，負責藝妓、娼妓的給牌營業許可。⁵⁴ 根據1911年11月2日的日記，他上午到竹仔街、總爺街派出所巡視後，下午則到下粗糠崎「貸座敷組合」的娼妓臨診場巡視，再經由南勢街回廳。11月11日，下粗糠崎「貸座敷」的廁所落成，他也和同事陣繼馬警部一同前往驗收檢查。11月25日、12月5日也都記載到下粗糠崎臨檢「貸座敷」一事，顯示出到「貸座敷」臨檢是日常巡邏的一部分，頻率、檢查項目則不一定。巡邏時除了到「貸座敷」臨檢，他也會到戲院、飲食店等地巡視。例如1912年1月15日，他下午到總爺街、下粗糠崎一帶巡視，晚上8點至11點半又巡邏一圈，其間即到南座⁵⁵ 臨檢，順便觀賞了當時正在演出的早川燕平「落語」（單口相聲）表演。⁵⁶ 1月21日，他凌晨兩點與陣警部一同到臺南市區的御影花壇、一筆

⁵⁴ 「臺南縣縣令第六號貸座敷營業區域」（1901年2月4日），〈明治三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五卷報告〉，《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613009。

⁵⁵ 南座：日本時代位於臺南市西門町2丁目的戲院，現址為臺南市民族路與西門路小公園圓環附近、萬泰商業大樓。

⁵⁶ 早川燕平為明治、大正年間日本落語家，1910年代數次來臺表演。此次到臺南表演為1912年1月15日開始、表演場地為南座，預定演出四日。參見〈臺南に於ける松鶴と燕平〉，《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月12日，日刊版7。

亭、安平の千鳥等料理店臨檢。

可知，吉岡升任警部補後，依照職務規定而在經過精密劃分過的負責區域內頻繁地巡邏。如前所述，他的頻繁巡邏，首先提高了地方民眾見到警察執行公務的機率，而能抑止潛在犯罪可能。再者，他的巡邏內容，不僅是到各派出所督導勤務，也時常順道巡視同樣是警察管控範圍的「貸座敷」、飲食店、戲院等地，係透過行政臨檢確認這些場所符合衛生、營業規範，顯示出警察對地方社會秩序各方面之高度掌控。

四、高等事務

吉岡的警部補生涯以1912年2月至7月到東京警察官練習所進修為界，前半期的職務以巡邏、巡查補教育為主，從東京回臺後的後半期，由於1912年9月起被分配到警務課的「保安係」，巡邏之外的主要勤務便改為高等警察相關事務。所謂高等警察，是在日本帝國1889年頒布憲法、1890年開始帝國議會後，為取締反政府政治運動而設置之警察部門，亦即相對於普通警察的政治警察。後來為取締共產主義運動，又分離設置「特別高等警察」。高等警察在日本國內活躍於大正民主期，受到執政黨的利用而主要扮演取締在野黨之角色。⁵⁷ 而吉岡從事之高等警察事務，受警察課、警察署、警察分署或支廳支派，工作內容大致為穿著便衣，從事視察取締集會結社、出版、罷工、日臺人爭鬥、勞動爭議等事，以及視察民情，並根據偵查結果製作報告、繳交給上級長官。⁵⁸

在此之前，吉岡其實已經接觸過高等警察相關業務。1909年1月至8月，吉岡任職於大目降支廳之際曾辦理過幾次「委任事項」，⁵⁹ 其中即包括處理支廳長的雜務（整理簿冊、文書）（1909年1月8日），以及辦理高等事務（1月9日）。

⁵⁷ 委任事項：1908年「廳警察職務規程施行細則標準」中第17條規定由支廳長所親掌之事務，包括高等警察及其他機密相關事項、重要的行政及司法警察相關事項、職員進退賞罰及身分相關事項，以及預算經理及調度計畫相關事項。參見戒能通孝，《警察權》（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頁53。

⁵⁸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輯，《臺灣地方警察實務要論》，頁91-94。

⁵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蹟篇」，頁528。

根據吉岡回憶，當時的大目降支廳長田中鷺郎警部相當信任吉岡，讓其幫忙處理自己親掌的高等警察事務、謄寫親展書類、編纂發送書類，以及巡查之賞罰、異動等機密事務，吉岡也以自己深受上司信賴而自豪。同年7月，田中鷺郎返回日本，改由關帝廟支廳長堤寬一郎接任大目降支廳長。此後吉岡雖仍承命處理支廳長委任事項（1909年8月3日），回憶錄中卻直言新任支廳長一手掌握所有事務、非常嚴格，自己做為下屬感到難為，甚至思考是否申請調職。9月14日吉岡接到調職噍吧哖支廳的人事命令。據回憶錄指出，該支廳是「公認最糟糕的地方」，據說支廳長可能受到想調回大目降支廳的同鄉所託，才將吉岡調至噍吧哖支廳。吉岡在日記中並沒有太多表示，只記載9月16日抵達噍吧哖支廳。不過，在回憶錄中倒是直接表明當時心中感到相當錯愕，甚至萌生辭職之意，只是礙於合約尚未到期，⁶⁰才接下調職命令。⁶¹

1912年9月，吉岡因職務調動再度接觸高等警察業務，後來在回憶錄中提到一開始並不習慣這項新職務，而是在「保安係長」安倍利三郎警部指導下才逐漸熟悉。⁶²他在這段期間的日記中，提到39次從事高等事務，大多沒有寫明工作內容。從頻率來看，一週約從事3、4次高等事務，同時也持續執行巡邏、臨檢等勤務。比較詳細提及工作內容的，即是10月26日及12月31日兩度提到從事報紙檢閱事務。依照1900年律令第3號頒布之「臺灣新聞紙條例」、府令19號「臺灣出版規則」，新聞報紙不得揭載妨害公安、法庭審判、有損皇室威嚴、外交或軍事機密等事項，違者最高可處停止販售等處置。⁶³依此來看，吉岡從事報紙檢閱的具體流程，即是不時翻閱報紙、檢視報導內容，遇有疑義者即撰寫報告上報（圖10），也就是思想、言論的監控。雖然他在日記中不常提到相關細節，但是1912年12月31日，本應是日本人迎接新曆新年前的除夕日，他卻仍自當日下午4點至臺南廳值宿且即投入報紙檢閱等事務，直到晚上10點半才就寢。由此可見，高等警察事務及報紙檢閱令吉岡相當繁忙，日常監控沒有假期可言。

⁶⁰ 根據1897年修訂後的「臺灣總督府巡查採用規則」規定，巡查於奉職前需於巡查教習所宣誓，承諾奉職未滿三年以前不得藉故辭職。吉岡於1907年8月3日拜命臺南廳巡查，要到1910年8月3日才滿三年合約。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績篇」，頁275、290。

⁶¹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45-46。

⁶²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57。

⁶³ 石川忠一，《臺灣警察要論》，頁165-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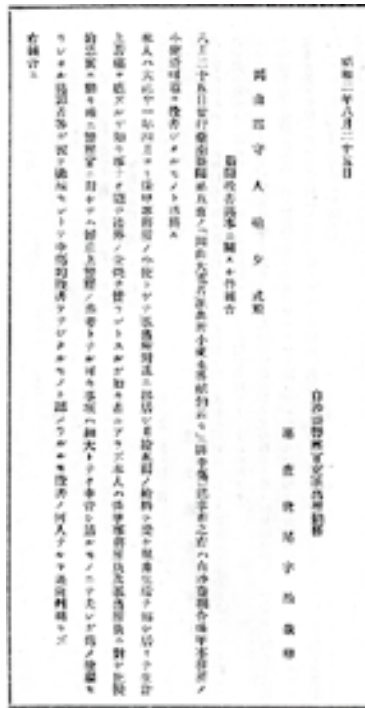


圖10、高等警察撰寫報紙報告範例（1920年代）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臺灣地方警察實務要論》（臺北：無名會出版部，1931年），頁215。

五、保甲事務

保甲是日本警察在臺灣地方社會執行警務、推動政策時不可或缺的助力，保甲的擴增情形亦和警力深入地方社會角落相輔相成。據蔡明志對警察監控空間的研究，1899年臺灣有345處派出所，1900年起總督府開始在臺灣全島增設派出所，當年度即增加至680處、成長近兩倍。1901年達930處，是前一年的1.3倍、1899年的2.6倍，增加倍數驚人。隨著警察所在的派出所增加，保甲組織網絡也逐步穩固，1910年時全臺即有4,869保、4萬8,360甲。⁶⁴ 前文已經提及，保甲組織在清領時期已存在於臺灣社會，在日本接收之際臺灣各地反抗勢力蜂起、社會秩

⁶⁴ 蔡明志，〈殖民地警察之眼：臺灣日治時期的地方警察、社會控制與空間改正之論述〉，頁153。

序動盪，促使殖民者將之接收、應用，成為警察在地方社會進行監控、掌握民情的助力。1897年，總督府在內訓中進一步將壯丁團招募標準化，並明訂警察負責監督壯丁團，並利用其輔助維持地方秩序。1898年公布「保甲條例」、「保甲條例施行規則」將保甲制度法制化後，⁶⁵ 1903年「保甲條例施行細則標準」明文規範保甲受警察官吏指揮（第21-25條），協助處理地方防災、戶口調查、傳染病預防、舉報犯罪等維安事務，並定期召開保甲會議。⁶⁶

在此，值得進一步注意保甲會議對警察與保甲間聯繫地方維安事務之功用。保甲會議是由保甲幹部代表保甲民議決保甲事務的機構，討論保甲內之處分、收支預算、負擔賦課等事務。開會、閉會時程依各保甲規約訂定，原則上每個月開一次會，有時亦依警察官吏命令召集臨時會議。在保甲會議之上還有保甲聯合會，由鄰近數保組成，一樣定期召開保甲聯合會議，議決保甲聯合壯丁團之經費、賞罰、規約等事項。⁶⁷ 警察與保甲之間的聯繫，大抵包括與保正甲長日常接觸，以及參加保甲會議、交換民情資訊。每次出席保甲會議後，還需要寫成報告留下紀錄（圖11），足見警察、保甲在落實統治政策、掌握地方民情上之密切配合。⁶⁸

吉岡是在升上警部補後，日記中才較



圖11、保甲會議狀況報告範例
（1920年代）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臺灣地方警察實務要論》，頁183。

⁶⁵ 「保甲條例」（1898年8月31日），〈明治31年8月臺灣總督府報第361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0361a001。

⁶⁶ 「保甲條例施行細則標準」（1903年5月9日），〈明治36年5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339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339a003。

⁶⁷ 江廷遠，《保甲制度叢書》（臺中：保甲制度叢書普及所，1940年），頁191-203。

⁶⁸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輯，《臺灣地方警察實務要論》，頁183。

常出現參與保甲事務之記載。1909年至1910年巡查時期，如前文提及一般，他大多負責內勤戶口業務，和保甲並沒有太多實務互動，只有1909年一度和支廳職員參加大目降街第一保保正、同街大使公廟及上帝廟管理者蘇有志家舉辦的婚宴。⁶⁹ 另外，1910年9月至1911年6月在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受訓期間，上課內容之一即是保甲相關事務，例如1910年12月29日、1911年1月11日日記都記載當日接受了該所囑託講師、臺灣總督府警部塩尻彌太郎講授之保甲相關課程。

1911年7月，吉岡以警部補身分回到臺南廳警務課任職後，參與保甲組織運作變成日常工作之一。警部補時期的吉岡和保甲組織之日常接觸，其一是因為任職於臺南行政中心的臺南廳，常有各保甲被召集至廳署或市區接受高層訓示的活動，此時身為警部補的吉岡也需要到場與會。例如1911年7月24日警務課長召集保正發表市區改正談話，⁷⁰ 或是1912年1月16日財務課長召集保甲發表繼承未定地登記事宜談話，⁷¹ 即使日吉岡並未當值、按照道理應該不用出勤，但還是到場了。究其原因，可能是吉岡感覺職務上有需要瞭解相關情況，才參與活動的。其二，也是最常見的接觸，即是保甲會議。吉岡在警部補時期（1911年7月至1912年）之日記中，8次提到參與保甲會議，其中5次是管區之一下粗糠崎街的保甲會議，3次為南勢街的保甲會議。從日期規律來看，下粗糠崎保甲會議的記載出現於1911年7月29日、8月16日、9月16日、10月16日及1912年1月17日，南勢街則是1911年7月31日、9月15日及1912年1月15日，兩地保甲會議召開頻率大致都是一個月1次，也代表吉岡一個月內平均要參加兩次保甲會議。會議地點都是在該街派出所內，因而吉岡會在固定巡視後直接到該處派出所繼續參加保甲會議，例如1912年1月17日從竹仔街到下粗糠崎街巡視後，至該街派出所與會，中午結束後回廳。

從日記中的記載來看，吉岡和保甲的接觸不僅止於公務，也包括私人拜會部分。像是1911年10月12日，他結束白天的轄區巡邏後，晚間7點至竹仔街的臺灣料理店水仙樓接受南勢街保正的款待。1912年2月2日，同樣在結束一天的外勤

⁶⁹ 《吉岡喜三郎日記》，1909年1月10日。承蒙審查人指出蘇有志身分，謹此致謝。

⁷⁰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1年7月24日。

⁷¹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2年1月16日。

巡邏後，他接受南勢街派出所職員及保甲幹部邀請，到水仙樓參加饗宴。吉岡接受保甲幹部的招待，當然主要原因是他身為保甲主管的警察官吏，地方民眾於私不一定必須和他往來、於公卻有上下權力關係，有時候可能必須邀請他與會。不過，吉岡也非單方面接受款待、高高在上的官吏。他在1912年8月結束東京進修、回到臺南廳之際，首先到在職的警務課打招呼，短暫回宿舍後，又到轄區南勢街、下粗糠崎的派出所及保甲事務所打招呼。⁷² 儘管保甲組織算是受警察管轄的下級組織，吉岡也是在結束進修、回歸工作崗位之前，好好地登門拜訪寒暄，顯示他和保甲組織的日常接觸即便多為公事公辦，亦有人情互動存在。

以上吉岡日記中對保甲事務的記載，多是以警部補身分參與保甲會議、監督保甲組織的部分。但是，警部補在地方已是小主管等級，負責監督事務進行，真正負責地方戶口調查、犯罪預防、公共建設等事務運作是人數較多的巡查，以及保甲組織。張麗俊撰寫的《水竹居主人日記》提供臺人保正與地方各級警察接觸的詳細情況，從而能補足吉岡日記在警察、保甲配合推定地方事務部分的闕如。

張麗俊出身臺中葫蘆墩（今臺中市豐原區），為清領時期中部地區平埔族岸裡社首任通事張達京之兄張達朝の後裔，家族以開發今臺中潭子一帶土地致富。1899年起張麗俊擔任葫蘆墩支廳下南坑第一保保正，歷任保正二十年，一直到1918年官司纏身才卸任。⁷³ 此時期的日記中，多所記載其和地方警察接觸、參與保甲組織及壯丁團事務之過程。對比吉岡日記，張氏在日記中不僅更為詳細記錄相關工作內容，亦記載較多個人心情，而更能反映出各人在地方秩序維護活動中的不同立場。以下，筆者隨機挑選了1908年4月、1910年11月的張麗俊日記，對比這兩個月張氏因從事保甲工作而和警察接觸之頻率及所為事項。

1908年4月1日，張氏前往廳役場開保正例會，支廳長宣布鼓勵捕鼠、協助提供建造乞丐集中處人力等事。4日，在路上遇見警官帶壯丁燒毀感染鼠疫者家屋。7日，接獲警察命令，需拆除水圳上的家屋，各戶店屋矮狹不整者亦需於三日內拆除（應亦是撲滅鼠疫之故）。8日，召集保內甲長討論實施大清潔法⁷⁴ 以

⁷²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2年1月16日。

⁷³ 〈張麗俊文書介紹〉，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208359>（2018/10/20點閱）。

⁷⁴ 大清潔法需將屋內物品拿出戶外洗曬，屋內打掃清潔，故若遇陰雨天則會延遲舉行。

防鼠疫。12日，到支廳報告保內孩童種痘後的狀況。15日，下午整理保甲費徵收簿，巡查樋口氏催促保甲連署造冊。21日，到役場參加臨時會議，支廳長著各保甲聽從巡查指揮，一同搜尋郵局丟失兩筆龍銀830圓、1,000圓。下午，樋口巡查召集各保一同搜索。22日，同樣進行搜索（後於24日他保找到1,000圓）。25日，到役場開會，討論領酒牌者以各支廳為單位共創一組合。26日，樋口巡查到保內檢查實行清潔法成果。⁷⁵

1910年11月1日，張麗俊與諸保正聚集於役場，支廳長要求各保提供修路開井民工。3日，適逢天長節（當下現任天皇生日），命長子清漣與各保正至支廳參加遙拜式。9日，到支廳報告保內家屋失火之事，又帶巡查木藤氏前往調查，再一同進支廳報告，被支廳長責備報告太慢。12日，木藤巡查到家裡巡視簿冊、回收甲長舊許可證。19日，帶保內文書到支廳欲交給木藤巡查，未遇到，遂置於其宿舍。20日，到支廳欲與支廳長商談保內壯丁死亡後難以選舉之事，因支廳長不在，遂向警部補報告此事。22日，送交壯丁死亡報告書至廳，再次確認不再另選、直接加一副團長。26日，巡查石松氏到家中檢查簿冊。⁷⁶

對照上述兩個月張氏的保正工作，都是在月初固定到役場參加保正會議，聆聽支廳長頒布命令。經確認1907年至1912年吉岡日記，也大致都是每個月至少有1次例會，提供基層行政官廳與轄區內保甲公布政策、要求其協助行政、瞭解各保甲概況的機會。有時候也有臨時召集會議，如上述1908年4月21日一同搜索郵局遺失錢財一事，或是1911年5月12日，支廳長臨時召集保正集會，要求各保提供1名壯丁供將來到豐原的守備隊差遣。⁷⁷

從保甲接觸之警察層級來看，保甲的每月任務多由警部兼任的支廳長在固定保正集會上宣布，再由基層巡查指揮保甲從事公衛、基礎建設，或是火災調查等細部工作。遇保內有失火或人員死亡事件，保正需儘速向支廳長回報，否則會被

⁷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29-40。

⁷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423-431。當下現任天皇為明治天皇，出生於1852年11月3日，故以11月3日為天長節。

⁷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55。

責罵怠慢工作。回報事項或保正集會時，如支廳長不在，會由其手下的警部補代之。保正需時時記錄保內人口、衛生、外來者、犯罪情形等報告，匯集成冊，由巡查在固定巡邏時檢查。由此可知，地方保甲最常接觸的警察是巡查（或臺人擔任之巡查補），聽其指揮從事造橋鋪路、支廳交辦任務，亦由之檢查保甲簿冊文書。到支廳回報事項或集會時，才會碰到較高層級的警部補、警部。對照前文提到吉岡在警部補時期才有較多接觸保甲之記述，亦符合此情況。

再看到遇到警察的頻率，1908年4月期間，張氏因保甲工作接觸警察10次、1910年11月則是8次，平均一個月近三分之一時間需從事保甲工作。並且根據呂紹理對張氏生活節奏之研究，當時雖有星期制，張麗俊的生活型態也還未如今日習慣一般週日休息。⁷⁸ 像是1908年4月12日為星期日，當天他仍是到役場報告種痘情況。4月26日星期日，接待樋口巡查檢查清潔法成果。當然，張氏擔任保正負責的工作種類之多、事務之繁雜、與警察配合之頻率遠超過以上隨機舉例的兩個月份所見，也無怪乎其在1906年2月14日日記中即感嘆（當時）歷任保正七年，前三年有保正之名、少保正之事，最後三年因法網漸密、規約增加而工作越來越多。⁷⁹

張麗俊在日記中記載身為保正與警察接觸之情形，除了上述工作項目外，還會記錄因工作和各級警察之公私交流情況。公務接觸方面，1906年9月19日，保內張文姜與巡查補口角而獲判拘留五日，隔日張氏即至支廳向廳長說明事情始末，以及該名巡查補作威作福事蹟，回家後還撰寫關於此事之證明書。21日，再至役場向區長詢問相關情況，得知田中忠次郎警部補隔日即會查辦該巡查補，遂回家。⁸⁰ 1907年1月17日凌晨3點，巡查椿、巡查補德水視察保內巡警，在門外大喊，將張氏驚醒，並責備其何以保內未巡警，張氏乃解釋因守更位置不便，明夜才開始巡警。當晚亦前往聖母廳，告誡庄民注意巡警，以備巡查前來檢查。⁸¹

⁷⁸ 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收入臺中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編者自印，2005年），頁376。

⁷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14。

⁸⁰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14-115。

⁸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64。

1909年6月11日，杉山警部補偕同農會員召開臨時會議，公布府令，要求民眾剷除白穗以除害蟲，張氏聞言不禁與其辯論，其只回覆府令如此，必須實行。⁸² 1910年2月1日，支廳長在保正例會中要求各保正加強勸誘保內婦人加入愛國婦人會，張氏拒絕配合，使得廳長十分不悅。⁸³ 1911年11月15日吉岡日記記載，定期實施大清潔法⁸⁴ 的固定做法，是要民眾拿出全部家具用品，清潔完畢後再收回，這對於臺灣人來說相當麻煩。對此，1915年4月27日，張氏於保甲會議聽聞巡查要求「清潔非比往年可潦草塞責奉行故事」，遂建議清潔器具時因移出不便、可以淨洗方式處理，後亦獲接納。⁸⁵

由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吉岡日記中較少提到警察指揮保甲進行工作時的會議討論情況、工作實行過程，都可透過《水竹居主人日記》瞭解。張氏身為保正，雖然需接受警部至巡查補等各級警察指揮辦事，但也不是事事言聽計從，仍有自己的主張，亦是相當注意維護民眾合理權益。像是保內民眾與巡查補衝突時，他會盡力向官廳解釋實情，檢舉巡查補藉權勢欺人。巡查半夜責備其未按要求令庄民巡警時，亦是耐心解釋，同時叮嚀庄民小心注意。會議上聽聞難以照辦之要求時，也會當場提出反論或建議。同時，也可以從張氏身為保正的視角，看到吉岡日記裡平鋪直述的開會、指揮保甲工作、大清潔法等，在臺灣人看來有些是勉強人民的無理要求，經保正代表民眾向官廳交涉，有時候會獲得調整。這顯示出地方行政雖是由警察掌控各個方面，也非警察單方面威壓強迫臺人聽命行事，居間的保正仍是有溝通調整的空間。

⁸²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182-183。

⁸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316-317。

⁸⁴ 據1905年11月總督府所頒布的「大清潔法施行規程」，大清潔法每年於春、秋兩季各定期舉行一次，由各廳長訂定施行日期，除了住家內外的掃除之外，排水溝浚渫補強、滅鼠等亦是工作的重點。參見「大清潔法施行規程」（1905年11月28日），〈明治38年11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870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11870a003。

⁸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180-181。

伍、地方警察的私人日常

相對於前文整理吉岡喜三郎擔任不同階段警職的工作情況，本節聚焦於其在警職公務之外的私人日常生活，包括下班時間、休假日、祝祭日，以及兩度進修生活等範圍。透過觀察他如何度過這些公務之外的私人時間，像是與誰交際、從事什麼樣的休閒娛樂，或是兩次長時間進修的私人生活，不僅可以立體地理解吉岡其人的個性，也能瞭解一名日籍基層警察如何融入臺灣地方社會、度過日常生活。

以下即分為休假日生活、人際交往、生病休養、兩度進修生活等四個主題，討論吉岡私人日常生活的多樣面貌。

一、休假日生活

所謂的休假日，可以粗略分成星期制下的週日，以及包括新曆過年在內的日本傳統祝祭日兩大類。關於週日，前文雖然提及身為臺灣人的張麗俊在擔任保正時並未固定於週日休假，不過，那也和張氏尚未習慣星期制有關。吉岡喜三郎做為一名警察，自然受到公務系統配合推行星期制的影響，故而每週日固定休假。其週日的過法，亦隨警職職位不同而有差異。

巡查時期的吉岡，每逢週日大多能確實休假，週日的日常大約是在家休息或出門各半。⁸⁶舉例來說，1909年2月7日，他提及週日休息、沒有外出而整日待在宿舍，這是此一時期他滿常見的週日過法。2月14日，他利用週日休假獨自外出散步；12月16日，進行室內大掃除，也是獨自度過週日的方式。其餘的週日，他會出門訪友或聚會，例如1909年1月17日，到臺南市區看牙醫、購置生活所需；3月21日，到臺南市區的醫院拜訪村井嘉太郎、桑島邦司等友人。4月4日，參加在大目降支廳會客室舉辦的歌牌大會，當天臨時臺灣糖務局糖業試驗場的人也來與會，相當熱鬧。除了與日本人社交，吉岡也參與所在地區的臺灣人地方社會節

⁸⁶ 《吉岡喜三郎日記》，1909年、1910年日記。日期於文中說明，為免繁雜，省略逐一加註。

慶，像是1909年11月7日週日休息時，北港媽祖出巡途經其所在的噍吧哖支廳，他便走出宿舍到街上看熱鬧。1910年1月29日下午5點，接受招待到區長家吃喜宴，直至7點30分才回宿舍。在上述獨自度過、出門訪友等活動之外，巡查時期的吉岡偶爾會應工作需求而在週日出勤。像是1909年2月28日，因值宿而從下午3點起處理許多件牛畜移動申請，或是5月23日，因川村竹治臺灣課長可能要來視察而自上午9點到廳待命至12點左右，後因長官未來而在下午開始休息。1910年4月17日，雖然是週日休假，依然到廳處理戶口照合事務。

吉岡在1910年8月升任警部補，到臺北受訓，其後於1911年7月回到臺南廳任職後，基本上只有非當值日才是假日，不再像巡查時期常固定於週日休假。例如1911年7月9日星期日，到前文所述轄區之西竹圍、元會境、三界壇、莊雅橋各派出所巡視，下午4點回廳後又當值到隔天。7月16日、10月15日，都是到非當值之後才離廳休息。12月17日，還在上午巡視完總爺街、下粗糠崎、竹仔街一帶，下午3點結束日勤後離廳休假。在平常日如7月12日星期三，雖未值班，但中午以前都在製作嫌犯調查紀錄，12點才回宿舍休息。7月14日星期五，同樣沒有值班，卻也須在下午6點前往火車站迎接「阿緱討蕃隊」回來。至於沒有值班時的假日過法，由於警部補時期的休假日被值班切得更為零碎，大概都是從事理髮（1911年7月18日）、回宿舍休息（1911年12月25日）等簡單活動。以前常有的訪友、散步（1911年10月3日），或是接受臺灣保正招待用餐等（同年月12日），都變成是常在非當值的零碎空檔進行。由以上事例可以很清楚看到，吉岡雖然因身為警察而比張麗俊在擔任保正階段有固定之週日休假，卻也僅限於工作相較輕鬆的巡查時期。待升任警部補而須負擔巡邏、值班、製作文書等更多、更繁重的工作後，「週日等於假日」之界線又再模糊，僅以值班與否劃定休假時間、從事私人交遊。

相對於星期制的週日假日隨警職變化而有不同過法，包括新曆新年在內的日本傳統祝祭日，則是即便遠渡殖民地臺灣，身為日本人的吉岡都需遵行之固有習俗。新曆過年部分，與上文週日過法類似，隨其警職不同而略有差異。巡查時代的1909年和1910年的新年，基本上都是1月1日上午在支廳舉行拜賀儀式，其後再到支廳長等各人宿舍拜年。特別是1909年過年，他從1月2日至5日大多在各個宿舍間飲酒、唱歌跳舞；1月6日上班還因前日宿醉而未用早餐、午餐。1910年因過

年休假日較短，1月1日至2日拜年、飲宴後，3日即開始上班、處理戶口事務。⁸⁷ 1911年的過年，由於正在臺北受訓，上課到1910年12月30日才結束，隔日購置日常用品、開忘年會，一路休息到1911年1月4日才再開始上課。過年的流程則和在地方巡查時期相近，1月1日由長官帶領舉行新年儀式後，到各個上司、友人的宿舍拜年，再與友人外出或飲宴。這時吉岡因身在臺北，1月3日還特別前往臺灣神社參拜。⁸⁸ 升任警部補後的除夕前，工作到1911年12月28日結束年度事務後，開始準備過年。1912年1月1日，參拜過神佛與「御遺跡地」⁸⁹ 後，到廳參與廳長帶領的新年儀式，其後一樣到各宿舍拜年。不同以往三年過年的是，前述「升任警部補後以非值班為假日」的法則並未以這次過年為例外，1912年元旦當天吉岡在上述儀式、拜年完畢後仍須值班，不過還是趁巡視轄區內各地點時，順道到該地區內的官舍拜年。隔天上午8點結束值班後，下午起拜年、與友飲酒談天，3日起即正常上班、外出巡視及檢視切斷電話線案件現場等。⁹⁰

與過年傳統相比，天皇制度相關的天長節、皇靈祭（天皇祭祖），或是象徵開展殖民的始政紀念日等祝祭日帶有較濃厚的政治意涵，身為殖民地統治者一員的警察必須出席官方紀念活動，使得吉岡在祝祭日的休憩型態不同於普通假日。例如1909年、1910年的11月3日天皇節，都先在支廳內舉行祝賀儀式，其後才各自在市場或廳內舉行祝賀宴會。臺灣人也會在宴會上奏樂，以表參與。⁹¹ 2月11日紀元節紀念日本建國，則在支廳舉行拜賀儀式，也在公學校舉行勅語捧讀式。⁹²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後於9月13日舉行「御大葬」當日，臺灣的官公署隨之停業三日，當天吉岡則是在晚上9點到臺南練兵場參與遙拜儀式。⁹³

⁸⁷ 《吉岡喜三郎日記》，1909年1月1日至6日、1910年1月1日至3日。

⁸⁸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0年12月30日至1911年1月4日。

⁸⁹ 御遺跡地：1895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領軍攻臺時，曾駐紮在臺南富商吳汝祥家，據說後來在此去世。1902年此處被改建為北白川宮御遺跡地，1920年改為臺南神社。戰後再被改建為臺南忠烈祠、臺南市體育館等建築。現今則是臺南市立美術館2館。參見〈臺灣臺南神社臺南遺跡地〉，收入「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https://tm.ncl.edu.tw/article?u=001_004_0000364099（2020/12/21點閱）。

⁹⁰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1年12月28日至1912年1月3日。

⁹¹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1年12月28日至1912年1月3日。

⁹² 《吉岡喜三郎日記》，1909年、1910年2月11日。

⁹³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2年9月23日。

殖民臺灣相關紀念日部分，1911年6月17日始政紀念日當天，正在臺北受訓的吉岡參加所長主辦的始政紀念儀式；1912年10月28日臺灣神社例祭放假一天，吉岡自行至臺南的「御遺跡地」參拜。不過，也有相關祝祭日未見舉行儀式的記載，像是1909年和1910年6月17日的始政紀念日、1909年9月24日秋季皇靈祭、10月28日臺灣神社例祭等。不過，雖然有時候某些節日未見其參與官方儀式紀錄，可能是吉岡寫日記時剛好省略，或者即便某些節日只放假而沒有特別的官方儀式。然而光是在當天休業、放假一天的這個舉動，便代表了遠在殖民地臺灣的日本警察們也參與建設日本國家祝祭傳統、帝國與殖民地關係開展紀念等的一環。即便是吉岡巡查時期身處臺南鄉下偏遠農村，也未置身事外。

二、人際交往

前文談到張麗俊擔任保正時與地方巡查的公私交際，以及吉岡度過假日的方式之一即為訪友等，已略微觸及日籍地方警察的人際交往面向。本部分討論重點聚焦於其之日常交遊、拜訪友人，以及與家鄉聯繫等人際交往面向。

吉岡無論是在臺南鄉下擔任基層巡查、或是後來升任警部補而到市區工作，平日都時常參與所在地區的婚喪喜慶活動，以維持人際網絡。特別在其日記中關於婚喪喜慶的記載，可以看到日本基層警察與臺灣人社會的互動，如1909年1月10日，吉岡與大目降支廳廳員一同獲邀至大目降街（今臺南市新化區一帶）第一保保正蘇有志家參加喜宴；1912年12月3日，參加臺南廳警務課今江貞興警部喪禮時，臺南地方有力者陳鴻鳴也獻上弔詞。也因為吉岡身為警察而居住在警察宿舍之故，和在臺日本人，特別是同事的警察社群保持緊密關係。像是參加過蘇家的喜宴後，便接著參加同為大目降支廳巡查的秋山幸作家新生兒祝賀儀式。當時來臺日人或因水土不服而患病、殞命，亦反映在吉岡日記中關於參與同事喪禮的記載。除卻今江警部的喪禮外，他在1912年1月4日也到曾於1903年任巡查的櫻井久之進家弔喪，隔兩天1月6日又到臺南東本願寺參加其喪禮。與1908年6月23日張麗俊對參加巡查喪禮的日記記述相比，吉岡在日記中對於參加婚喪喜慶的記載較為簡單，僅記載其事而未抒發心情。不過，這與記載者的性格有關。吉岡在日記中屢屢記述參加這些活動，亦是紀錄其對維繫人情的頻繁活動。

除了不定時參加婚喪喜慶外，吉岡在工作閒暇之餘也常拜訪友人、參加聚會。像是1909年1月12日，吉岡結束勤務後，便與鈴木雄八（同支廳巡查）、村井知德（後為臺南廳安平支廳警部補）到知母義庄派出所巡查村井嘉太郎家吃飯。1910年5月3日工作結束後，到公醫館一起聽「落語」、音樂，直到半夜12點才回宿舍。1911年8月20日，上午到同廳巡查江頭潔家遊玩，其後在三界壇、元會境、竹仔街、下粗糠崎逛過一圈後，下午又坐火車到臺南市區，拜訪松本通藏警部補宿舍、警務課及其課長家等處。吉岡在日常工作後訪友之外，有時也趁有事外出時拜訪平日較少見面的友人。例如1910年7月16日，為了參加兩天後的文官考試口試，而提前至友人、臺南廳警務課囑託的木牟禮有由家借住。7月18日考完試後，7月19日回到大目降，還先到友人中村博之家借住一晚，另一名友人桑島邦司（臺南醫院職員）也來相聚，歡談到半夜。又如1912年1月7日，陪同廳長到臺北出差時，隔天1月8日下午便前往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拜訪之前受訓時受其照顧的前田豐太郎（同所書記）、倉持信治、下村庸（教官、舍監）、御廚規三、伊藤宗也（教官）等長官。其後，又與正在同所受訓的第16回警察官部甲科練習生早瀬覺次郎（南投廳警部補）、八角德三（南投廳巡查）、加藤俊二（臺南廳巡查）等人會面。

從吉岡的日常交遊多為日籍警察同事，可以看出在臺日籍警察社群因同住宿舍而關係相近，日常相約飲宴或參與彼此的婚喪喜慶活動自是當然。再者，從吉岡來往的多為警界同事，以及1912年1月趁隨行長官出差拜訪之前受訓時予以照顧的長官、正在受訓的警界友人，都可看出其用心維繫上司、同輩或後輩等警界人脈。擁有這些人際聯繫，對其日後在警界生存、升遷都有助益。

吉岡自1907年渡臺赴任後，一方面與任職當地的日本人、臺灣人社群建立人際網絡，另一方面亦透過書信、匯款維持與家鄉親人的緊密聯繫。例如1909年1月23日，吉岡收到父親吉岡宗治郎從千葉老家寄來的袴（日本傳統男性禮服下裳摺裙）及書籍包裹。同年8月13日，接獲家裡來信告知妹妹せつ生產的消息。吉岡來臺工作後，也會不定期匯錢回家。這是由於他從1907年來臺之初在練習所時即有總計28圓的月薪，考量到一個月需用10多圓，剩下部分便匯回家交由父親保管，以備在臺醫療、旅行費用及其他不時之需。⁹⁴ 匯回家保管的金額並不固定，

⁹⁴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41-42。

像是1909年4月1日、11月6日均匯40圓，1910年12月28日匯60圓。

吉岡與家人的關係相當親近，1911年10月23日至29日父親還來臺灣探望，他也請假陪父親到臺北、臺南、打狗（高雄）等地參訪臺北新公園、安平港、旗後砲台、臺灣神社等名勝古蹟。⁹⁵ 他在日記裡並未提及父親來臺理由，對照回憶錄則可知，當時其父是帶著他尚未謀面的新婚妻子山崎花來臺相聚。此前吉岡22歲還在故鄉千葉之際，曾因身為木材商次男難獲父親分產，遂到鄰近富豪菅澤家入贅，但因不習慣農家粗重勞動、飲食而作罷。⁹⁶ 渡臺投身警職之初，想著三年約滿可能就要回國，任職之初巡查職位不高也找不到好對象，故而未急著結婚。直至1910年升任警部補，年屆而立，便感到建立家庭的必要。經老家父兄物色，選擇鄰村東京產婆學校畢業而時年已23歲的山崎花為妻。吉岡本想在1911年練習所畢業後回國結婚再返臺，又因父親性好旅行且想到臺灣觀光，遂先在老家舉行沒有新郎的結婚儀式，再由父親帶妻子來臺相聚。⁹⁷ 結婚未久，又於1912年2月至8月到東京警察官練習所進修。這次他帶著渡臺未久的妻子回到睽違五年的日本內地，安頓好入所事宜後，2月24日、25日便到千葉縣匝瑳郡須賀村高拜訪還未曾去過的妻子娘家親戚，也與老家的哥哥榮亮吃飯。7月31日，吉岡在練習所結業後，接獲留在東京兩週的命令，便趁此機會回老家拜訪親戚朋友，報告在臺生活、到當地公所露面、參拜鄰近神社寺廟等。後又獲准延長一週假期，在老家待到8月21日出發返臺。當時因妻子已經有孕，為免舟車勞頓影響胎兒，吉岡便隻身返臺，妻子則留在娘家待產。⁹⁸

從上述吉岡從警後與在臺的臺日人群、老家親人的人際互動可以看出三點。其一，他積極參與地方社會臺日人群的婚喪喜慶、日常飲宴，也利用機會維繫既有警界人脈。雖說其升職係靠己身努力通過考試而來，但參與考試、受訓都需長官推薦，以及警界友人協助應試。平日用心經營的人脈，幫助他在臺灣的日常生活不致無聊且能專心投身工作，也藉此建立屬於自己的獨立生活與職業成就。其二，即便遠渡臺灣，吉岡一直都相當關心家中情況，不僅常與家人通信、寄送包

⁹⁵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1年10月23日至29日。

⁹⁶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29-31。

⁹⁷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51-52。

⁹⁸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2年8月2日至22日；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54-55。

裏，也信賴父兄為其存款及擇偶。其三，投身警職對其而言，不僅能累積存款，也在升任警官後獲得自己滿意的婚姻、成立家庭。可以說，到殖民地投身警職，使吉岡能跳脫因木材商次男出身而無法獲得如意家產、婚配的過去，獲得職業上、家庭上之雙重成就。

三、生病休養

如同前文略微提及的，許多日本人來臺灣後因水土不服、衛生與醫療體系尚未整備完全，而常罹患疾病、喪命。上一部分也談到，吉岡1907年來臺灣後開始存錢的原因之一，是為了準備生病就醫費用的不時之需。在他的日記中，無論是自己生病，或是探望朋友病況，乃是稀鬆平常之事。

出身溫帶國家日本的吉岡，到臺灣後常因不適氣候、飲食而生病，從而臨時請假休養。例如1909年4月20日、5月12日，他都在半夜感覺到自己「似乎得了瘧疾」，遂請假一天在家休養。1911年8月9日，吉岡上午離廳後感到不適，隔日起因感冒而請假兩天在家靜養。吉岡生病時大多像這樣請假一兩天在家休息，但也有嚴重到連續請假多天的時候。例如1909年7月5日，他白天參加點檢操練時因酷暑感到不適，下班後回宿舍平躺休息，夜半還發起燒來。接下來的兩天接連發燒、退燒，請假在家休息，找公醫美野辰治治療，都未見起色。7月10日，因發燒、嘔吐、拉肚子等病情加重，終於決定到臺南川田醫院住院。住院期間，同事村井嘉太郎巡查因到院看病而順道來探視。接連住院治療幾天後，終於在7月20日離院，但仍未完全恢復，遂請假五天在家靜養。⁹⁹ 不過，有時候他生病也不是單純受環境病菌影響。像是其性好飲酒，亦有因此累及健康的事例。1911年9月16日，吉岡下班後參加阿緱、臺東兩廳討蕃隊慰勞會，會中大家喝了4箱酒而酩酊大醉。會後不久，吉岡或因飲酒過度或吃壞肚子，開始嘔吐、拉肚子，接下來六天都請假在家休養。

由於當時日本人在臺灣生病、住院並不罕見，單身者與同事、朋友互相照護，或到醫院探望病患，成為日常生活的一環。吉岡在單身時期常協助照顧住院

⁹⁹ 《吉岡喜三郎日記》，1909年7月5日至25日。

的友人，如1909年8月1日，整天照顧生病的桑島邦司（臺南醫院職員）、「片刻不得閒暇」；1910年4月25日，山下伊助（同廳巡查）住院，他便住到醫院兩天，協助照顧病患及辦理許多事項。1912年10月2日至20日，吉岡因咳嗽有痰，甚至出血，請假在家休養十多天，期間除多次到臺南醫院就診、在家靜養，就是接待前來宿舍探病的福西信太郎、松本通藏、安倍利三郎等同事或上司。如同前文也提到的，吉岡自己或友人生病時，其他人或專程到醫院、宿舍探望，或到醫院看診時順道探望在該院住院友人的情況相當常見。他的這些朋友多是警察同事、醫院職員，因生活圈相近，而能在彼此患病時形成一個守望相助的人際網絡。

四、兩次進修生活

如同前述，吉岡在1909年至1912年從警生涯初期，曾有兩次長時間進修機會，得以離開平日繁忙事務。儘管要面對繁重課業、訓練，他仍因暫時從警察職務中解放，而有更多的私人生活空間。以下簡述吉岡兩次進修的課業經歷，關注重點仍在其如何度過進修時期的私人生活。

吉岡從警後的第一次進修生活，是1910年9月至1911年6月就讀臺北的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甲科。入所之初，他已於前月晉升警部補，故而擔任甲乙科練習生總代表，在入學儀式上致詞。甲科練習生月給含本俸28圓多，上課科目有憲法、行政法、法學通編、刑法、刑事訴訟法、警察法、衛生法、醫學、統計、鴉片、指紋法、度量衡、土語、武術、操練等。由於很多科目講師缺席時都以土語填補上課時數，故而土語上課時間相當多。1911年2月，臨時測驗中位居6、7名，不夠優秀，開始擔心6月結業時本因任官而能擔任總代表致詞的風光機會不再。但他也不喜歡停止週日外出遊玩而一味唸書，最後還是以邊玩邊用功的方式在6月中考試拿到平均85分的最優秀成績，如願在7月1日結業式以學生總代表身分上台致詞。至於臺北進修期間的私人時間，吉岡在回憶錄中簡單提到，星期日或祝祭日放假幾乎都必定外出，星期三下午沒課可外出時也大多會外出。外出之際，時常與同學一同到市場吃冰、紅豆湯，有時也喝一點啤酒。¹⁰⁰

¹⁰⁰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49-50。

這段時間的日記，確如回憶錄所述，平日星期一到六上課時間都在學習各類知識，間或從事擊劍或操練等體能訓練；星期三下午、星期日或祝祭日放假則幾乎都外出。外出之際，他大多是獨自購物、就醫或訪友，例如1910年9月11日，一早外出購辦各類事物後訪問柏原甲子之助、竹內久次。18日，看完牙醫到糖務局拜訪大山金能、到臺北開會的臺南廳長及城南派出所的河邊等人。1910年11月3日天長節放假，他外出造訪臺南廳的同事江頭潔，前往舍監小澤武憲家探病，再到大山家玩。1911年4月9日，到大山家借腳踏車，經圓山騎往大稻埕一帶，回來後接受紅豆湯款待，再到臺北醫院探訪同期生吉岡琢治。入學兩三個月逐漸與同期學員熟稔後，開始出現眾人一同外出遊憩的記載，如1911年1月3日新年假期，上午和同期生松本隆一、野口要一、大裏清藏一同借腳踏車前往臺灣神社參拜，在圓山下茶店休息；下午則參加同期生親睦會，一同聯絡感情。2月12日，一早到西門外街拜訪堤寬一郎，順路前往新起街市場（今西門紅樓一帶）吃紅豆湯；下午跟大山借腳踏車參拜臺灣神社，還腳踏車後又和松本到市場紅豆湯店吃蕎麥麵、喝啤酒。5月7日，與同學松本隆一、宮澤範治一同外出購物，到大塚冰店吃冰，晚上還有無名會（練習所的親睦社團）聽留聲機活動。6月25日，還與松井等五名同學一同到淡水海水浴場遊憩，再到北投松島屋泡澡、喝啤酒，回到臺北市區又吃冰，相當盡歡。此外，由於同期甲科生有十一名來自臺南廳，於1911年3月12日一同到日之丸旅館拜訪北上出差的澤井瀨平警務課長，又於3月19日一同到該館拜訪高橋傳吉打狗支廳長。平日上課時間原則上不外出，但若需要辦事，則可經申請而外出。像是1911年4月24日星期一，結束一整天的操練、上課後，因要拍攝寄給廳的照片而申請外出許可，前往新起街東洋寫真館拍照後回所。

吉岡第二次進修，則是1912年2月至7月前往東京進入警察官練習所。據其日後回憶，這次他不僅回到睽違五年的日本，還是進入堪稱「警察大學」的警察官練習所，獲得如此榮譽，令其感到無比得意。1912年2月11日，吉岡抵達日本後，不久即開始在東京的忙碌進修生活。課業方面，接受憲法、行政法、刑法總論與各論、刑事訴訟法、警察行政、國際法、一般衛生、細菌學、花柳病、統計、火藥、狩獵法、電氣、消防、指紋、信號、操練等學科訓練，不時還需到傳染病研究所、衛生試驗所、監獄等職務相關機構參訪。經過緊湊的四個多月學

習，他在最終考試中獲得平均86分的中上成績。原訂7月31日的結業式，因明治天皇於前日逝世而取消。¹⁰¹

這段期間的私人生活，除了2月兩次簡短回老家、妻子娘家，以及在7月結業後於8月回家三週，其他的就是常趁週三下午沒課、週日休假在東京一帶訪友、外出散步或參拜神社佛寺等。¹⁰² 如1912年2月18日，上午打掃宿舍後，下午外出至愛宕神社、靖國神社、上野東照宮、淺草觀音寺等處參拜，買一些東西，並對上野、淺草一帶人潮雜沓印象深刻。3月6日，結束警察統計、電氣、狩獵法課程後，搭電車前往四谷的飯塚家（臺南廳警務課課長澤井瀨平之弟）拜訪澤井之子澤井主一。4月21日，上午前往荒川邊的淺草雷門、南千住一帶散步，觀賞河堤邊盛開之五色櫻花，再參拜淺草觀音，度過心情愉快、身體疲勞的一天。4月28日，趁練習所到神奈川縣秦野町視察水道，途經鎌倉住一晚的機會，到江之島神社、鎌倉大佛、長谷寺觀音等處參拜，也和同樣從臺灣來的兩名同期生福西信太郎（臺南廳警部補）、柴田一平（澎湖廳警部補）在市街上散步觀光。5月19日，與柴田一同到兩國觀賞相撲比賽，還遇到裕仁親王等三位皇孫也來觀賽。6月2日，前往神奈川的大山參拜，在各處佛寺、神社祈禱及購買一些土產，因穿草履登山而感到腳痛。

總結吉岡兩次進修，可說都是其從警初期的職業生涯「亮點」，期間的私人生活也各自反映出因不同身分、生活型態而有的心境變化。1910年臺北進修前剛升任警部補而踏上升官路途，一方面因任官而產生考慮結婚大事的信心；另一方面亦把握此次機會，擴大了島內警界人脈。他相當重視這群在練習所認識的長官，1911年7月結業不久，即在7月5日寄謝函給練習所予以照顧、教導的龜山理平太（所長）、加福豐次（教官）、小澤武憲（舍監）、岡野才太郎（講師）等人，年底也寄上賀年卡，¹⁰³ 還於1912年北上出差時順路拜訪上述長官。除了長官之外，吉岡也沒有忘記維繫與同期生巡查們的聯絡。同期生之中，他和大裏清藏早在入所前的1909年即有聯繫，¹⁰⁴ 入所中時常一同外出遊玩，結業後也有

¹⁰¹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頁53-56。

¹⁰²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2年2月至7月。

¹⁰³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1年「收發控簿」169至191項、382至401項。

¹⁰⁴ 《吉岡喜三郎日記》，1909年「收發控簿」289項。

信件往來。其他在入所時認識、熟稔的同儕，特別是非同屬臺南廳之若梅研太郎（嘉義）、石井忠夫（桃園）、菰田西藏（桃園）等人，結業後也都寄予謝函、賀年卡，¹⁰⁵維持聯繫。1912年他回日本進修時，不單是從臺灣回日本進修僅有三名的警部補之一、象徵從警生涯又攀高峰，還「衣錦還鄉」回到五年未歸的故鄉，並前往新婚妻子娘家，對此感到相當風光、得意。回到日本，他趁休假日外出時拜訪在日本的友人、與臺灣人脈相關者，顯示出注意到維繫臺日雙方人脈的努力。同時亦利用休假或外出參訪的機會滿足久未在故土旅行、參拜神佛的喜好。8月底回國後，他同樣用心維繫在東京進修時構築的人脈，於年末時寄賀年卡給練習所的講師橫山雅男、小濱松次郎、山川好、額賀仙太郎，以及同期生柴田一平等人。¹⁰⁶

要之，吉岡一方面透過兩次進修機會暫離日常繁忙職務，多出一些私人時間可從事休閒活動、聯繫親人朋友；另一方面亦透過私人交遊建立更廣大的人際網絡。從進修後逢年過節不忘祝賀、趁工作出差聯繫進修時代長官朋友等舉措，尤其顯示出其以進修生活的私人交遊反過來協助建立警界人脈，增加後續從警職業生涯更上一層樓之機會。

陸、結論

本文的核心問題，是日本殖民地時期臺灣獲稱「警察社會」，其實際狀態為何？為了解答這個疑問，遂以1910年代前期日籍警察吉岡喜三郎所留下的日記為中心，參照同時期臺人保正張麗俊日記及吉岡個人回憶錄等其他史料，分析當時基層警察如何養成、如何在地方展開監視網絡，以及其生活的多樣面向，藉以檢視日本殖民地時期「警察社會」的實際樣貌。

透過吉岡日記觀察吉岡喜三郎的從警生涯，首先可以了解臺灣總督府如何調整制度而在殖民地臺灣社會各個角落建立警察系統，以及建立此一系統後，持續

¹⁰⁵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1年「收發控簿」188至190項、410、411、417項。

¹⁰⁶ 《吉岡喜三郎日記》，1912年「收發控簿」（發送）317、321、324、325、364項。

經由內部訓練、職業教育養成熟悉地方情況之基層警力，令其成為推動殖民政政策的執行者。警察在地方值勤時，持續透過日常巡邏、保甲會議而收集地方情報，層層回報，亦同時傳遞統治政策要求，儼然成為殖民權力與地方民眾的訊息中介。透過這些外出活動，警察代表殖民權力之形象亦深入人心，達到一定程度的遏止犯罪作用，從而能維持社會秩序穩定。不過，經對照臺人保正張麗俊日記，進一步發現日籍警察與臺灣民眾間並非單方面的上下從屬關係，而是有反映政策不合民情而促成調整或修正之空間。筆者推想，這是由於對殖民者而言，因地制宜地微調政策，比起強硬壓制民眾服從更為節省統治成本並能收取統治成效，所以在一定範圍內容許被殖民者提出修改意見。

再者，吉岡日記提到許多工作內容，能清晰、立體地呈現殖民者透過警察在地方展開日常監控的過程。提到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獲稱「警察社會」，識者多半可以舉出戶口調查、犯罪即決、思想檢查、保甲組織等重要事例，來說明臺灣社會在哪些方面受到監控。不過，並不是殖民者下達一紙行政命令，這些政策便自動生效、持續影響力。以戶口事務為例，透過吉岡日記的記載，吾人才初次認識到，光是一項戶口簿冊整理、更新事務，就要花上一名基層警察半個月以上的工作時間。戶口簿冊記載資訊複雜多樣，每日每月都要更新現況，占去基層警察大半工作時間也是合理的，此中還需要保甲組織的多方配合。而正是這樣旁人看來枯燥、單調、重複的日常例行公事，方能維持統治者藉以瞭解臺灣社會動態、訂定相應政策之龐大人口資訊系統，也才有從事地方社會監控的情報依據。

若是從上述實行統治政策、展開地方監控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把警察看作是殖民者掌控地方社會秩序、推行政策的工具是很合理的。過去的研究由於多半缺少日人警察角度之材料，而常側重於臺人對其控制地方的反抗和疑懼。但是，警察畢竟不是純粹工具，而是生活在地方社會中的人類，故而在公務交辦之外，也會和地方民眾私下交流。從常理來看，警察要順利推展地方勤務，也不能一直和地方人士維持相互敵視狀態。吉岡日記中記載其回歸工作前向地方保甲打招呼，反映出維持工作禮節，顯示他對協助自己推行警務的保甲至少保持著基本尊重。再對照《水竹居主人日記》，張氏等臺灣人士不時與日本警察聚餐，固然有可能因為警察是地方行政、執法者，有時需表現出樂於招待的樣子。然而，以張麗俊平時仗義執言、不畏權勢的個性來衡量，也不能排除地方警察和民眾之間有

善意交流的可能。

過去因史料性質多偏向官方公文書，而較少受到討論的日本警察在臺私人生活，也能透過吉岡私人日記及回憶錄予以重建。吉岡原來是千葉鄉下木材商的次男，因分產無望、婚姻不順，而到當時機遇較為多的殖民地臺灣從警。透過從事警職累積的資金、名望，他得以跳脫上述不如意而建立理想的事業與家庭，為後續人生成就打下基礎。在臺灣地方社會擔任警察，於公事上需與臺灣人社會、日本人為主的警界緊密配合，而在地方上建立私人生活。他利用公忙之餘的休假日、兩次進修之私人空間，不僅從事舒緩身心的休閒、聚會活動，亦以探病、參與婚喪喜慶等活動維繫臺日人際網絡。這樣的人際交流不僅成為他在臺灣地方生活的支柱，也能在後續警職發展中發揮支持效用。而透過陳述吉岡私人生活，也能呈顯出日籍警察在臺灣除了發揮監控作用、協助殖民統治建立「警察社會」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在地方社會實際過生活的平常人面貌。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吉岡喜三郎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吉岡喜三郎在臺時期照片〉。

《吉岡喜三郎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臺灣總督府（官）報》（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明治29年10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4期〉。

〈明治31年8月臺灣總督府報第361期〉。

〈明治34年5月臺灣總督府報第962期〉。

〈明治35年1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088期〉。

〈明治36年5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339期〉。

〈明治38年9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831期〉。

〈明治38年11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870期〉。

〈明治38年12月臺灣總督府報第1887期〉。

《臺灣總督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明治三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五卷報告〉。

〈昭和六年七月至九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

二、史料彙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下卷）：司法警察及犯罪即決の變遷史」。臺北：編者自印，1942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蹟篇」。臺北：編者自印，1934年。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輯，《臺灣地方警察實務要論》。臺北：無名會出版部，1931年。

三、日記、回憶錄

吉岡喜三郎，《古稀の思出》。千葉：長谷川明郎發行，2008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01年。

四、報紙、官報

《臺南廳報》，臺南，1911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2年。

五、專書

石川忠一，《臺灣警察要論》。臺北：新高堂書店，1915年。

江廷遠，《保甲制度叢書》。臺中：保甲制度叢書普及所，1940年。

戒能通孝，《警察權》。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

雲野修治，《實務資料 犯罪即決》。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23年。

鷺巢敦哉，《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臺北：出版者不詳，1938年。

六、期刊、論文集論文、學位論文

吳宗仁、張雅淨，〈日治時期行政統治策略之後殖民分析〉，《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24期（2005年12月）。

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收入臺中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編者自印，2005年。

李幸真，〈日治初期臺灣警政的創建與警察的召訓（1898-190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林佩欣，〈臺灣總督府統計調查事業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

姚人多，〈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臺之殖民治理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

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第8卷第1期（2001年10月）。

蔡明志，〈殖民地警察之眼：臺灣日治時期的地方警察、社會控制與空間改正之論述〉。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

蔡慧玉，〈日治時期臺灣行政官僚的形塑：日本帝國的文官考試制度、人才流動和殖民行政〉，《臺灣史研究》，第14卷4期（2007年12月）。

七、網路資料

〈1907年市區改正臺南市街全圖〉，收入「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2018/9/20點閱）。

〈吉岡喜三郎文書介紹〉，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251776>（2018/9/10點閱）。

〈張麗俊文書介紹〉，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208359>（2018/10/20點閱）。

〈臺灣臺南神社臺南遺跡地〉，收入「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https://tm.ncl.edu.tw/article?u=001_004_0000364099（2020/12/21點閱）。